

柯倫泰在中國： 喧賓奪主的男性本位情慾譯介與在地轉化

許慧琦*

本文從20世紀前半葉俄、中兩國的歷史背景，勾勒俄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家亞歷山卓·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的跨國思想之旅。我以她在民國時期最受爭議的情慾／戀愛觀為主，考察她對中國社會既重要又獨特的思想影響。柯倫泰的情慾思想在民國譯介的來龍去脈，特別鮮明展現出外來學說在跨文化思想演變的過程所經歷的意識形態與性別化操作，能如何扭轉學說原貌而為中國人所用。我期望藉此探究柯倫泰情慾論述的精髓，並分析中國的政治及性別文化語境如何賦予其論述新意。

本文的研究發現，柯倫泰的情慾著述在蘇俄與中國男性本位的左翼跨文化語境中，經歷了某種「三重脈絡性別化」的轉譯過程，由此導致她的女性主義思維被誤讀扭曲。在此，我發揮了台灣翻譯學者單德興的「雙重脈絡化」概念。我以「三重脈絡性別化」來指涉中國男性譯介者在蘇共高層、日本論者及自身立場此三方男性本位脈絡的交互影響下，詮釋並評論柯倫泰的情慾作品，乃至於主導了中國讀者對她情慾思想的認識。受上述「三重脈絡性別化」的多層因素影響，使當時民國論者譯介柯倫泰作品時，出現「喧賓奪主」般的主客易位論述現象。亦即，不少中國作者對柯倫泰著述的譯介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與討論，若非片面採信日本評論家的觀點，就是自我發揮演繹。這樣的譯介態度，導致柯倫泰的思想真義難以為中國讀者所知。

關鍵詞：柯倫泰、民國社會、情慾論述、翻譯、一杯水主義

一、前言

19 至 20 世紀，見證了全球各地陸續發展情慾現代化的歷程。所謂「情慾現代化」，乃指突破傳統權威宰制個人情愛選擇和性慾表達的思想與實踐。¹ 這意味著形成以情感為道德準則且具性意識的主體認同，肯定愛慾對個人身心理、婚戀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個人對性別、情感和性慾的理解和表達方式逐步突破傳統，以開展性別平等、允許自由表達的性關係。情慾現代化既關涉個人主體性的建構，也意味女性得以衝決禮教網羅，有更多表現自我的選擇。

在近代中國追求與展現情慾現代化之際，曾積極引介各家外國思想來指路。其中，俄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家亞歷山卓·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曾發揮過獨特的影響。²柯倫泰位居俄國革命元老之列，亦為布爾什維克政權(большевик)第一位女部長。她在 1920 年代，經歷政壇情場兩失意、後被派為外交官的起伏歲月，卻反在此時開始展現跨國的思想影響。柯倫泰的中文譯著最早可見於 1920 年；但其情慾作品直到 1928 年，才開始現身中國出版界。當時與柯倫泰作品切合的「戀愛加革命」文學模式正興，一時仿效者頗眾。然而左翼文青對柯倫泰的思想多一知半解，任意挪用發揮她的情慾及婦女解放思想為己所用。此使柯倫泰的情慾觀在民國社會雖曾發揮影響，卻鮮少有人掌握其真意。

本文考察柯倫泰的情慾思想在民國譯介的來龍去脈，以呈現外來學說在跨文化思想演變的過程所經歷的意識形態與性別化操作，能如何扭轉學說原貌而為中國人所用。藉此，我期望探究柯倫泰情慾論述的精髓，並分析中國的政治及性別文化語境如何賦予其論述新意。20 世紀初具國際聲望的馬克思

¹ 近代世界的情慾現代化過程，實與性別的多樣性及同性情慾的萌發，及由其衍生關於正常／異常性慾表現的各類專業論述，息息相關。但有鑑於柯倫泰的情慾著述乃集中於異性戀關係，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情慾現代性主要集中於對異性戀情慾的討論，特此說明。

² 本文提及外國人名、著述標題與詞彙時，在中文翻譯後加上原文括號。若來自俄國，便以俄文示之，以此類推。

女性主義者不乏其人，如德國的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與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然其中以情慾思想著名者，則非柯倫泰莫屬。上述三位都切實宣揚馬克思共產主義，但唯獨柯倫泰強調透過重新定位情慾來更新階級道德。柯倫泰對愛情與性慾課題的重視，讓她長期承受布爾什維克黨內男女同志的不滿與批評。但也是情慾論述，使柯倫泰雖自1930年代在蘇俄勢散聲消，卻在20世紀後期重獲國際社會重視。³

柯倫泰的情慾著述在俄國及東亞等國際社會的傳播走向，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發展緊密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佛拉迪米爾·列寧(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1870-1924)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力推翻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以無產階級之名建立了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從該年底到1920年代中期，蘇俄政府陸續頒布法令，根本改變攸關個人的婚姻、家庭、兩性關係與生育發展。俄國社會自大革命後，在個人性行為表現與性道德內涵上的巨變，引發國際毀譽參半的評論。⁴不論正反評價，革命後充滿政治社會動盪的俄國社會，確實經歷了性論述蓬勃發展、性關係多元實驗、性文化百花齊放的時光。此種發展，與1920年代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面對黨內外挑戰而力求鞏固政權，形成微妙的互涉。十月革命後，支持臨時政府的孟什維克(меньшевик)等陣營不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內戰旋即爆發。翌年俄國與德國簽訂協議後退出歐戰，但內戰仍持續數年。1921年，列寧有鑑於因應戰需強制徵收農糧而造成生產衰弱與地方暴動，推動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放鬆貿易限制並允許商品交易。⁵

1920年，蘇共黨內出現一股稱為工人反對派(Рабочая оппозиция)的反對勢力；其發言人，便是列寧政府中唯一的女部長柯倫泰。這群黨員批評新經濟政策向資本主義投降，黨中央官僚墮落。⁶工人反對派到1922年在黨中央鎮

³ 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50期(臺北，2022.06)，頁1-41。

⁴ John Levi Martin, "Structuring the Sexu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5, no.1 (1996): 105-151.

⁵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3-148.

⁶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223-227.

壓下消散；柯倫泰也被拔除時任婦女部部長頭銜。在黨內失勢的柯倫泰選擇遠離政權中心，並在 1922 年秋接受了駐外的使節工作。她開始改以小說創作，表達對革命後新情慾關係及新女性何去何從的思考；此舉卻又讓黨內領導階層益發不悅。柯倫泰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地位起落，與她忠於共產主義理想及其前衛的情慾言行皆密切相關。她在政治聲望高張時，即發表不少解放婦女與重塑無產階級性道德之作。即使她享有革命領袖聲譽，卻因執著於宣揚(女)性解放，而在禁慾心態瀰漫的布爾什維克黨內顯得格格不入。列寧便領銜譏諷柯倫泰混亂的私生活，並暗示她宣揚無愛而隨便的性關係，使她因此被扣上「一杯水主義」始祖的帽子。(詳後)列寧與史達林等政黨高層，交相藉由批判及醜化柯倫泰的公私言行，來貫徹中央意志，肅清反對派勢力。⁷這些批判與刻意扭曲柯倫泰情慾觀的黨內論述，暴露出布爾什維克透過性課題來展現權力、干涉個人、壓制私慾的統治本質。

柯倫泰的情慾論著雖在她失勢後的俄國招千夫所指，卻透過翻譯獲得國際聲望，引發包括東亞在內許多外國讀者的熱烈討論。⁸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柯倫泰信奉馬克思學說，主張透過階級鬥爭進行社會革命解放無產階級。不同於早期男性共產主義領袖少談愛情，柯倫泰特別重視社會革命後無產階級性關係的前景。為此，她撰寫多篇論說文詳細闡述理念，也透過小說及其開放性結局提供讀者思考。她的小說較知名者，有〈赤戀〉(Василиса Малыгина, 1923)、〈三代的戀愛〉(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1923)及〈偉大的戀愛〉(Большая

⁷ Barbara Evans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30-263;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6-247.

⁸ 陳相因，〈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 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9 期(臺北，2011.12)，頁 1-31；吳佩珍，〈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收入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20)，頁 139-165；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頁 1-41。

любовь, 1927)。⁹這些文學創作，皆反映革命後俄國的階級、戀愛及道德的複雜交織，及無產階級女性的生存與解放之道。尤其〈三代的戀愛〉較具道德爭議的性關係描述，使柯倫泰為此飽受俄共抨擊。1920年代，柯倫泰的政論與小說以及日本論者對她作品的評述被陸續譯介到中國，激起中國左翼陣營的諸多爭辯。

台灣學者陳相因長期鑽研柯倫泰，累積了豐碩精彩的研究成果。¹⁰本文希望在陳相因的研究基礎上釐清柯倫泰情慾與女性觀的精髓，並綜述民國論者的跨文化性別轉譯。我將闡明柯倫泰透過批判資產階級婚戀與愛情觀所闡揚的新女性與情慾解放，其終極目標是為了建構無產階級新性道德。她從未認同一杯水主義那種有慾無愛的性關係。

本文的研究發現，柯倫泰的情慾著述在蘇俄與中國男性本位的左翼跨文化語境中，經歷了某種「三重脈絡性別化」的轉譯過程，由此導致她的女性主義思維被誤讀扭曲。在此，我發揮了台灣翻譯學者單德興的「雙重脈絡化」概念。單德興用「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來表述他的翻譯理念與實踐之道。他主張譯者應兼顧原典與譯本所由出的文化時空背景，才能更善盡翻譯作為溝通兩種文化的橋樑角色。¹¹我則以「三重脈絡化」，指涉中國譯介者在蘇共高層、日本論者及自身立場此三方脈絡的交互影響下，詮釋並評論柯倫泰的情慾作品。列寧對柯倫泰情慾觀的知名負評，關鍵形塑國際共產世界理解／誤解她的政治文化脈絡。此可證諸於日本左翼人士常引列寧的觀點，作為評判柯倫泰情慾論述的政治正確圭臬。日本左翼論者對柯倫泰的評述，隨即被引入北伐後的中文語境，引導中國論者片面解釋柯倫泰的戀愛觀。當時熱烈討論柯倫泰著作的中國左派文人又順水推舟，藉柯倫泰著作偷渡他們自身渴求的性自由慾望。柯倫泰的情慾思想在民國社會，便因譯介者此番「三重脈絡化」而出現面貌更迭。

⁹ 關於柯倫泰的兩部小說之出版資訊，見陳相因，〈嫵嫩、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4期(臺北，2019.03)，頁78。

¹⁰ 參見前面註釋所引多篇文章。

¹¹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09)，頁1-8。我非常感謝劉季倫教授，推薦我這本書。

但檢視此一跨文化轉譯時，若忽略男性本位的意識霸權，仍將無法真正掌握柯倫泰在中國的形象演化及其變因。所謂男性本位，即以男性的經驗、特質與需求為人類普遍的優越標準，來維持其既有政治統治、文化資源與社會優勢的價值觀。本文將申論蘇共、日共和中共陣營裡男性本位的政黨意識或婚戀態度，交相左右民國社會對柯倫泰情慾思想的認知。柯倫泰及其小說女主蓋尼亞之所以從俄國到海外各地，屢遭醜化、誤解與批判，都與其女性身分有關。我將論證此一「三重脈絡性別化」如何形成民國社會譯介柯倫泰的男性本位思想框架，主導了中國讀者對她情慾思想的認識。

我用「喧賓奪主」來概括象徵當時民國論者譯介柯倫泰作品時，受上述「三重脈絡性別化」的多層因素影響而出現的主客易位論述現象。以下，我先系統評析柯倫泰的女性及情慾論述重點，以說明其思想的獨特價值且易遭誤解之處。之後，我將析論北伐後幾年間左翼男論者譯介柯倫泰作品時的政治思想背景，及他們如何發揮演繹柯倫泰的戀愛觀。我也會說明柯倫泰的中文譯介在 1930 年代後，出現前人學者未注意的轉向。某些嘗試突破男性詮釋向度的女權解放思維，將在其中現身。此外，透過梳理這些時代脈絡的演變，我嘗試多方考察柯倫泰的情慾／戀愛觀與一杯水主義在中文語境的掛勾與脫鉤。綜上，本文希望逐步顯現柯倫泰的作品如何在中外多方思想交流中，參與造就民國男性本位的現代情慾論述。¹²

二、催生無產階級道德：柯倫泰的女性與情慾論述

本節將概述柯倫泰從 1900 年代末到 1920 年代圍繞情慾而發的女性本位論述，以闡釋她既本於又修正共產主義的理論，及存在她的政治選擇與思表

¹² 民國時期其實有女性作者基於女性本位思維來與(未能被全面理解的)柯倫泰作品對話。但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及此。相關論述，見許慧琦，《破繭而出：民國女性本位的跨文化現代情慾論述(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即將出版)。

述之間的矛盾張力。¹³我將聚焦析論柯倫泰具代表性的著作，以凸顯其情慾觀特色。在簡述柯倫泰的生平及其著作發表的政治氛圍後，本節將闡明幾個要點。首先，柯倫泰的情慾觀呼應、但又超越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她堅信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能局限於經濟物質等唯物史觀界定的下層建築，更應從文化心理等上層建築進行攻擊，以防其死灰復燃。她認為經濟自主雖是女性解放的根本基礎，卻不會必然解除女性家庭、婚姻與情慾的桎梏。對柯倫泰而言，唯有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上下層建築進行雙重進攻，才可能成功建立取而代之的無產階級文化。其次，柯倫泰的情慾思想重點，不在性慾或情愛的滿足，而是切合無產階級意識的新親密關係及其所符合的集體規範，亦即性道德。職是之故，柯倫泰強調愛情的社會與心理成分；她高度重視愛情對凝聚與發展群體聯繫的重要性。要言之，柯倫泰是在集體的層次上，去重塑戀愛的意涵並闡揚多元親密關係的社會價值。

柯倫泰承襲並超越馬克思、恩格斯與倍倍爾(August Ferdinand Bebel, 1840-1913)等共產主義領袖對解放婦女的論點，強調女性在家庭私領域遭受的體制、性別與性壓迫。對馬恩等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家而言，去除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制這兩大壓迫女性的根源之後，婦女便得獲解放。此種思想只從經濟體制出發思考婦女問題，卻忽略男權體制根深蒂固的慣習、心理與性別秩序造成的壓迫。柯倫泰則雖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主張社會與經濟體制的徹底變革才能解放婦女，卻關切更多在日常生活中桎梏她們的身心、思想與發展的權力機制。她發現家庭制度與母親角色，是任何階級與身分的女性皆受制於男性的集結點。¹⁴讓女性掙脫家庭與母職的枷鎖，遂成為柯倫泰女性解放的論述重點，也是她表現出女性本位思維之處。

¹³ 女性本位思想，包括批判既有兩性觀與性別分工原則造成的女性社經劣勢，以及將女性與家庭密切連結導致女性生產價值具劣勢的性別分工等各種男性中心價值觀。女性本位思想主張個別女性可適性發展新角色、探索非主流性別特質，或以自己為重。

¹⁴ Alexandra Kollontai, "From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58-74.

在她著名的〈家庭與共產主義〉(1920)中，柯倫泰偷渡了自己希望家庭制度終將瓦解以真正解放女性的激進思想。她這篇代表布爾什維克對廣大俄國工農婦女進行政治宣傳之文，不只複述前人對家庭的批判及改善措施，更表達其家庭無用論。她發現男權體制根深蒂固的慣習、道德與性別秩序對女性造成的壓迫，都源於家庭及其性別分工。她在此文宣稱共產主義的各種公共組織，將使女人擺脫清潔、料理、洗滌與照護四大家務勞動。¹⁵此外，她更強調女性在家庭私領域遭受體制、性別與性等多元壓迫。對她而言，家庭的存在本質與女性(被視為輔助而不具生產性)的低落勞動價值息息相關。唯有讓家庭中的生產、養育與家務責任由國家漸次接手，讓家庭失去意義而走入歷史，女性才能真獲解放。¹⁶與此相應，她預期在工農群眾中結合的新婚姻，能真正展現「自由，平等與同志愛」。¹⁷柯倫泰理想中的新婚姻不再依附於家庭，而是在各種公共化的新社會設施中進行。夫妻無同住義務，為人母者可自由決定與兒女的關係；且女子不論已婚未婚，都將獲得政府妥善照顧。¹⁸

柯倫泰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新道德論述，堪謂她在十月革命後對共產主義理論最重要的貢獻。革命及其後發展，為俄國社會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俄共疲於應付內戰、恢復經濟生產與鞏固政權之際，唯獨柯倫泰認為布爾什維克應致力於重建(兩)性關係。她明確表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將由共產主義道德(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而非法律，來規範符合工人集體和子孫後代利益的性關係。¹⁹為此，柯倫泰全面批判資產階級的愛情、婚姻與性觀念，並在此一批判基礎上，建構進步與健全的無產階級性道德。

柯倫泰特別抨擊資產階級性道德的雙重標準，即要求女人以性無知／純潔表達美德，卻縱容男人切割情與慾於婚姻和召妓。她盤點資本主義體制下

¹⁵ Alexandra Kollontai,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250-260.

¹⁶ Alexandra Kollontai,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253.

¹⁷ Alexandra Kollontai,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260.

¹⁸ 柯倫泰著，沈茲九、羅瓊譯，《新婦女論》(上海：三聯書店，1951)，頁 209-247。

¹⁹ Alexandra Kollontai, "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228.

婚戀與情慾價值觀的缺失，包括因疏離孤立而空虛寂寞，將伴侶視為人身財產獨佔，吝於示愛，表面正經私下放縱的虛偽，以及用錢買性而窒息人類愛的感受。²⁰對柯倫泰而言，這些缺失交相造成當時社會的性危機。為使愛情展現切合無產階級互信互助、互利與團結等價值觀的活力，柯倫泰倡導奧地利女作家葛蕾特·梅塞爾-海斯(Grete Meisel-Hess, 1879-1922)在《性危機》(*Die sexuelle Krise*)提出的「愛情演練」(德文 *Liebesspiel*，俄文 *игра любви*)。²¹

正是「愛情演練」及由此衍生的新女性與情慾論述，使柯倫泰的著作雖廣受國內外關注討論，卻讓她成為黨內異類，而與中央意志漸行漸遠。「愛情演練」乃海斯為人心扭曲、物慾橫流的社會現狀提出的救急之道。依柯倫泰的詮釋，「愛情演練」是尚無能力實踐「大愛」(*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的人類應先進行的情感練習。柯倫泰理想的「大愛」，是單一性伴侶的結合，彼此身心融會交流、且裨益後代與群體發展的情愛關係之極致表現。為使大愛得以實踐，必須去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孤立疏離、雙重性道德等使情感異化的阻力，使人們能真正體會與表現愛。愛情演練，旨在克服這些阻力，訓練男女建立親密關係，以便日後能落實大愛。柯倫泰強調愛情演練絕非一夜情或純性交，也非關佔有、不涉忌妒，而是一種習愛的藝術。那是一種既要求心靈、感官與性格去全面感受，卻又學會不在激情中失去自我的細膩情慾體驗。重點就是透過戀愛去「體驗」愛人與被愛。²²推介完「愛情演練」之後，

²⁰ Alexandra Kollontai, "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 225-231.

²¹ 對於海斯原文的「Liebesspiel」，其英文版本翻為「Sport of love」。柯倫泰以之對譯的俄文「любовь-игра」，其英文譯本為「game of love」。1920年代末的中文世界，則將之翻為「戀愛遊戲」(見本文下一節)。但綜觀海斯與柯倫泰的文意，比較接近中文的「(鍛鍊)運動」或「演練」，而非帶有某種恣意玩樂嬉戲的「遊戲」。由於中文的「運動」還有另一種政治動員的意涵，在此無關，所以我選擇將「Liebesspiel/любовь-игра」譯為「愛情演練」。見 Grete Meisel-Hess, *The Sexual Crisis: A Critique of Our Sex Life*, trans. Eden and Cedar Paul (New York: The Critic and Guide Company, 1917), 125-131;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in Alexandra Kollontai, *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trans. Alix Holt (Bristol, Engl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2), 15-26.

²²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15-26.

柯倫泰凸顯社會經濟體制徹底變革的必要性，以讓此演練有真正實踐的餘地。她表示，雖然連續的單一性伴侶應是性關係的基礎模式，但社會須進化到能接受所有無損健康，且無涉交易行為的情色友誼(эротическая дружба)。²³她並特別重視社會必須從制度、法律到社會心理，都真正尊重與保護自由母性，使女性不會在愛情演練中吃虧。

引介「愛情演練」之後，柯倫泰開始將新女性建構為開展無產階級新道德的行動主體。她在〈新女性〉(1918)一文，描繪出新女性獨立自主，能盡職工作也能充分享樂的鮮明形象。柯倫泰堅持家庭與愛情絕不應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她認定當女性得以在社會充分展現潛能與創意時，不會再任由愛情吞噬身心，或讓自己喪失自我。在她眼中，這些新女性的社會理想會比激情快感或心靈喜悅更神聖更有價值。²⁴柯倫泰特別強調新女性積極自覺、要求平等與主動抗拒權威等特質，都符合無產階級意識。她賦予新女性「反叛」(Бунт)既有性秩序的重要使命，即擺脫以性純潔展現美德的資產階級模式，來重新估定(Переоценкой)性道德標準。柯倫泰認為，戀愛與性慾在新女性投身的科學、社會、創作等神聖志業面前，皆可退居二線。²⁵

柯倫泰雖主張兩性結合應自由且可多元，卻再三強調性放縱對個人身心與集體生活的損害。她宣稱共產主義道德承認個人對性的正常興趣，不主張性抑制或禁慾。但共產主義道德同樣反對過度或身心未成熟的性關係，因為那將傷害勞動人口的健康、工作效能與群體內部的友好聯繫。同理，柯倫泰也從種族優生保健的角度出發，反對只有性交無情愛的關係，也反對有遺傳疾病者生育。她相信男女交合孕育下一代時的身心狀態，會影響孩子的健康與生活能力。要言之，柯倫泰堅持情感與性慾在男女交合的關係中缺一不可，不論其形式或長度為何。²⁶她期許無產階級男女不斷精進發展智力與情感表

²³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15-26.

²⁴ Alexandra Kollontai, "New Woman," in Alexandra Kollontai,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 trans. Salvator Attanasio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49-104.

²⁵ Alexandra Kollontai, "New Woman," 49-104.

²⁶ Alexandra Kollontai, "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 225-231.

達，使純粹生理的需求遞減，幸福美好的愛情體驗則日增。²⁷柯倫泰這番理念，迥然異於所謂「一杯水主義」那種無節制、無情感基礎、純以性欲一拍即合的任意交合。

柯倫泰 1923 年的〈為有翼愛神開路！〉，再次挑戰唯物史觀偏重改變下層建築的革命論，並總結她多年來宣揚的共產社會新道德之內涵。該文透過「有翼」與「無翼」愛神的轉喻，分指情慾平衡與純粹肉體的兩性關係。柯倫泰藉此呼籲勞動青年在有翼愛神的引導下，追求無產階級的愛情理想。她表示，有翼愛神要求關係當事人花心神時間投入、經營及交流，而回報其以身心的滿足幸福。無翼愛神則不耗時費力也無傷心神，任由生殖本能激發的性慾彼此交合，卻無任何精神喜悅。內戰時，人人處於爭鬥緊繃的非常狀態，只顧滿足性本能，因此無翼愛神勢勝。如今武裝鬥爭終結，是時候迎回有翼愛神來催生符合無產階級新道德的兩性關係。〈為有翼愛神開路！〉提出「同志愛」(Любовь-товарищество)做為共產社會新親密關係的理想型態。在柯倫泰的設想中，共產主義社會的愛情是具有凝聚力而能啟發創意的精神情感，其成分豐富而異質。²⁸此種愛情，非僅單弦彈出的二人獨奏曲。每個人不同面貌的情、意、興趣與需求，都能找到對應與合奏的對象，多弦共譜出諧調的群體情愛交響樂。這就是柯倫泰所謂「轉變後的愛神」(преображенном Эросе)在共產社會帶來的情感進化。亦即，在和諧團結的集體氛圍下，發展兩性與人際關係。她強調這樣的多面親密情愛經驗，應符合關係平等、互相尊重不佔有、以及雙方都發展善解人意個性的三大原則。她期許「轉變後的愛神」啟發勞動青年驅逐競爭、自私、佔有、忌妒等愛情舊元素，以共情互助等「愛的團結」(Любовь-солидарность)，讓社會成為情感有機體。兩人結合的那種婚姻或愛情型態之重要性將漸減，人們感情的公共性與各方多重聯繫會增強。²⁹

²⁷ Alexandra Kollontai, "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 225-231.

²⁸ Alexandra Kollontai, "Make Way for Winged Eros: A Letter to Working Youth,"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276-292.

²⁹ Alexandra Kollontai, "Make Way for Winged Eros: A Letter to Working Youth," 276-292.

至此，柯倫泰已闡明她重塑資產階級的愛情模式，來宣揚無產階級基於「同志愛」的新情慾觀，及以此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新性道德。她在〈三代的戀愛〉所描摹隨不同世代與意識型態而更迭的情慾價值觀，也只是以文學體裁，來發揮之前論著的觀點與思考。同於 1923 年出版的〈三代的戀愛〉，因敘述了近似於一杯水主義的性關係，而引發熱議。這部小說透過一家三代女性彼此互異的情慾觀，映照俄國戀愛與性道德的過去，並思索未來前景。其中，蓋尼亞(Женя)這個孫女輩的性關係最引讀者非議。蓋尼亞與母親的同居人發生過性關係，後來發現自己懷孕想墮胎，卻不知小孩父親為何人。³⁰柯倫泰將蓋尼亞描繪為充滿活力熱情、自信快樂的蘇維埃新女性，在工場上班、對白俄奮戰、從事饑饉救濟運動，並兼地方蘇維埃委員及共產黨基層組織書記。蓋尼亞表示並非不知愛為何物，但強調自己無時間心力戀愛，也自認並未奪去母親能從同居人處得到的愛。小說末尾，以「有權利的究竟是誰呢？——有新的感情，新的概念，新的道德的新興階級的未來權利的，究竟是誰呢？」的疑問，留待讀者思考。³¹

〈三代的戀愛〉雖以開放式結局為終，但不難從柯倫泰之前的論著理解蓋尼亞實非柯倫泰理想情慾表現的典型。蓋尼亞式的性行為，既不符合柯倫泰期待「轉變後的愛神」帶來的新道德，甚至也非藉「愛情演練」來體驗愛人與被愛的兩性新親密關係。若以柯倫泰前作來解讀〈三代的戀愛〉，可發現祖母孫三代，分別映照(祖)資產階級式的僵化戀愛觀，(母)小資產階級自以為解放的自由戀愛觀，(孫)以及革命內戰時純肉無靈的性慾觀。柯倫泰對這三種情慾表現，都批判過；這其中，沒有一種能代表她的理想戀愛與新性道德觀。她的小說是希望藉由反映內戰前後俄國性愛關係與道德觀的演變，來刺激讀者思考未來的方向。

³⁰ 陳相因在她研究〈三代之愛〉的文章中，說明蓋尼亞等民國時期使用來對譯「Женя」之中文名，依據的是日文譯本，因離俄文原音出入太大，所以她採取俄音直譯的「瑞娘」。我雖然很同意，但由於本節會觸及民國論者對「蓋尼亞主義」的討論；為求不讓讀者困惑，本節仍將以「蓋尼亞」來翻譯「Женя」。

³¹ Alexandra Kollontai, "Three Generations," in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of Worker Bees*, trans. Cathy Porter (London: Virago, 1977), 182-211. 此處中譯文，見柯倫泰著，芝葳譯，〈三代的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31。

柯倫泰反資產階級傳統的新情慾論述最大特色，便是著重從集體福祉出發，闡揚戀愛與親密關係的社會價值，建立共存共榮的無產階級新性道德。徵諸上述，柯倫泰的情慾思想重點並非性慾；她甚至認為無產階級的新親密關係愈發達，性慾需求愈無關緊要。³²然而，她卻是俄國內外公認身體力行、積極提倡性慾解放的女權論者。此種形象，實由列寧的抹黑、國際社會對共產主義的刻板印象，連同國際讀者對她作品的斷章取義共同促成。俄國大革命後赴俄採訪的美國記者路易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 1885-1936)，曾記錄她與柯倫泰幾次會面的經過。布萊恩特描述柯倫泰對國際社會普遍謠傳俄國共產黨將婦女「國有化」之事，感到異常憤怒。³³布萊恩特未曾提及國際社會將柯倫泰視為一杯水主義的創始者，因此我們無從得知柯倫泰是否也曾對此「謠傳」表達抗議。或如陳相因的研究指出，柯倫泰雖曾多次挺身反對列寧，但面對老同志史達林當權後的肅殺氛圍，也識相噤聲以求明哲保身。³⁴柯倫泰的情慾觀原貌，就在她後來選擇沉默與他人的片面誤解之下，不斷被扭曲。

三、性與愛的分合：〈三代的戀愛〉初現中國引發的熱議與誤解

柯倫泰其人其思在東亞的傳播，象徵著日、中、韓各國知識人對共產主義、戀愛演進與女性解放的多元臆想及理念投射。柯倫泰是在民國社會現身的外國共產主義女性領袖當中，引發最多爭論且迭遭誤解者。她被認識的身分多元，主要有革命家、政治家、文學家、女權論者與外交官(大使)。她的中文譯作主題多圍繞家庭、婦女、戀愛、性慾與道德，文類以小說所占比重最大。

³² Eric Naiman, *Sex in Public: The Incarnation of Early Soviet Id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6-227.

³³ Louise Bryant, *Mirrors of Moscow* (New York: Thomas Seltzer, 1923), 118-119.

³⁴ 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頁1-41。

陳相因的著作理清了柯倫泰的政治表現與情慾思想在俄、日、中共產世界的交織流轉，及主導論者走向的性別政治跨國背景。柯倫泰的情慾論述在華的譯介與接受，則非陳相因的研究重點。而若想較宏觀掌握民國不同階段及男女論者對柯倫泰情慾思想的詮釋，則須從時人討論婚戀、貞操與性慾的脈絡出發。1920年代的中國，在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論述針鋒相對之際，迎來柯倫泰思索共產社會(兩)性關係的作品。³⁵觀諸史料，可知柯倫泰最受民國論者熱烈討論的階段，集中於1928到1937的抗戰前十年。政治上，那是國民黨結束北伐實行訓政，中共絕處逢生續求發展之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於1927年4月12日對中共進行「清黨」，即中共所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結束了國共第一次合作。但思想左傾的文人青年，仍在此後的文藝界推行革命文學與大眾文藝運動，發揮廣泛影響力。³⁶與此同時，北伐革命所翻滾起的解放慾望並未立即消散。柯倫泰的情慾譯述，在1920年代末的上海文壇，適時掀起關於戀愛與性慾的討論熱潮。直到1930年代前期，柯倫泰的情慾著述仍成為自由派及左翼作者爭辯性愛關係的焦點。柯倫泰的情慾觀透過這些論戰與眾人相交月旦，而備受矚目。其中一證據，是「柯倫泰主義」這個字眼出現並沿用於1930與40年代。新詞彙乃依社會需要而產生，以反映新事物或新觀念。「柯倫泰主義」的現身，說明柯倫泰思想能代表某種觀念或主張。「柯倫泰主義」在中國被詮釋的意涵，則濃縮民國時人對柯倫泰思想的理解(或誤解)。

本文後半將以民國社會關注的戀愛問題為主軸，整體考察時人對柯倫泰作品的階段性譯介及其情慾論述的本土演變。柯倫泰其人其思在民國社會的足跡，映照出反禮教、甚至反五四的左翼青年，欲掙脫戀愛羈絆並回應時代情勢的現代情慾與新性道德觀。源自西方的戀愛思想，自1910年代末透過翻譯傳入中國。初時，譯介者重在清楚傳達歐美作家的思想，以便介紹戀愛

³⁵ 關於民國階段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論述的對立等發展，見許慧琦，《破繭而出：民國女性本位的跨文化現代情慾論述(1912-1949)》。

³⁶ 相關史料，可見梅子編，《非「革命文學」》(上海：光明書局，1929)；丁丁編，《革命文學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30)；丁易編，《大眾文藝論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51)。

為何物。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被尊為戀愛宗師，其著作廣受論者多方詮釋闡述。³⁷當時戀愛自由論的勁敵，是禮教傳統與自由戀愛。眾多譯介者的努力，使戀愛自由論在中國出版界立穩腳跟。戀愛神聖、靈肉一致，成為主張戀愛者的共識。但時至歷經政治社會革命浪潮的 1920 年代後期，戀愛自由論開始出現新對手。就如俄國內戰時期出現一杯水主義的性關係，北伐期間的中國也不乏有肉無靈的情慾主張與實踐。簡言之，1920 年代末中國談論戀愛的大環境與思想氛圍，都與該年代初期不可同日而語。

我將論證北伐後譯介柯倫泰情慾著作的中文作品，經歷了「三重脈絡性別化」的過程，而展現遮蔽其女性本位思想的男性知識霸權及喧賓奪主的論述特色。民國論者多承認柯倫泰是繼倍倍爾之後，討論婦女與性問題最具分量的共產主義思想家。然而，倍倍爾的作品獲得中文出版界一致推崇，柯倫泰對情慾與性道德的描繪卻引發熱議，毀譽參半。柯倫泰將性慾等同於食慾等本能需求的觀點，早已出現在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但為何倍倍爾所謂「性本能的滿足，與其它自然本能的滿足一樣，是個人私事」的論調，未引人批判，柯倫泰的類似說詞卻遭人非難？³⁸此箇中原因，可由「三重脈絡性別化」的視角加以分析理解。倍倍爾作為資深男性共產主義思想家及德國社民黨領袖的身分，為他在德國及國際社會奠下權威地位。當他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中文譯作出版後，多數中日論者推崇此書為社會主義論婦女問題的經典。³⁹亦即，倍倍爾是在廣受國際與中國社會主義者讚譽的雙重背景下，被左翼知識界接受並廣為徵引。

柯倫泰的情況恰與倍倍爾相反：蘇共對她人身與作品的批評，日本左翼作家的片面解讀，以及國內第一線譯介者的主觀擇取，交纏出三重具有性別化思維的譯介脈絡。蘇共與日本論者的評述，皆未完整呈現柯倫泰的情慾觀。

³⁷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7 期(臺北，2021.06)，頁 1-69。

³⁸ August Bebel, *Women Under Socialism*, trans. Daniel de Leon (New York: Labor News Company, 1904), 343.

³⁹ 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婦女問題十講》(上海：開明書店，1927)，頁 52；倍倍爾著，沈端先譯，《婦人與社會》(上海：開明書店，1927)，頁 XXII；章錫琛，〈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婦女雜誌》，第 16 卷第 7 號(上海，1930.07)，頁 63-66。

但這雙層「海外雜音」，卻普遍主導並干擾中文譯介者詮釋柯倫泰的思想。且在這中外三重翻譯脈絡下，更隱含著對柯倫泰的性別偏見及連帶的思想誤解。列寧身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通過對柯倫泰婚戀問題的揶揄並以一杯水主義影射她的思想，為日本及中國左翼作者的性別化譯述做出示範。柯倫泰的女性身分及其婚戀史，常成為中國論者品評其情慾觀的一部分。不少中文文章出現誇大她情史的不實內容，將她的四段情愛關係渲染成她結過三十幾次婚。⁴⁰此種以理所當然之姿以訛傳訛的現象，暴露出男性主導的譯介評論對女作家的窺淫輕佻意識。反觀當時引介倍倍爾著作的論文，並不旁及其婚姻或情史，而只就理論理。這種對介紹倍倍爾與柯倫泰所抱持的雙重標準，反映當時以進步解放自居的左翼陣營仍殘留著大男人主義思維。

1928年，章錫琛主編的《新女性》月刊成為引介柯倫泰情慾論述的首要舞台。該刊自1926年創刊以來，承襲章與周建人離開商務之前，在《婦女雜誌》積極介紹婚戀自由與新性道德的反禮教姿態。《新女性》出刊四年期間，持續宣揚與捍衛戀愛道德思想。時值國共合作已破裂的1928年初，章錫琛形容當時「思想界沉寂萬分」。⁴¹他決定迎來新思想作為談資，為不甚活絡的婦女問題討論注入活水。柯倫泰的〈三代的戀愛〉連同相關日文評論作品，便成為章錫琛首選的活水。

章錫琛選擇以柯倫泰的小說作為譯介她打頭陣的文本，關鍵奏出了民國論者誤解柯倫泰情慾觀的狂想序曲。具開放式結局的小說文類，特別提供讀者更多想像、討論與延伸發展的空間。此或許即章錫琛為何以〈三代的戀愛〉為文本，來進行名為「新戀愛問題」徵文討論的主因。他並選譯日本左翼作

⁴⁰ 柯倫泰的婚戀史，主要有過兩任丈夫與兩位情人。見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7. 關於中文作品中提及「據說」柯倫泰曾換過三十個丈夫者，例見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33-1051；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47-1362；洪鈞，〈六：『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79-1383。

⁴¹ 〈排完以後〉，《新女性》，第3卷第3號(上海，1928.03)，出版頁。

家林房雄(1903-1975)與高群逸枝(1894-1964)關於柯倫泰戀愛觀的正反評論文，供讀者參考。章錫琛隨之邀請讀者和國內思想家把對「這幾篇文字的讀後感」，寄到《新女性》。⁴²三個月後，即1928年12月，「新戀愛問題」討論隆重登場。

「新戀愛問題」作為柯倫泰情慾作品現身中國的處女秀，卻因小說文類特色與海外雜音，而使原典精神大為走調。不同於專論性著作，小說容易出現的問題，在於讀者無法確知主角言論是否真正傳達作者想法。最鮮明之例，是論者經常逕自以〈三代的戀愛〉中蓋尼亞的情慾表現，來代表柯倫泰的思想。甚且，伴隨此小說出現在同一號《新女性》的林房雄文，不期然卻嚴重誤導了中國讀者理解柯倫泰的情慾觀內涵。由默之所譯的林房雄文〈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整體肯定柯倫泰的戀愛與新女性思想。林文闡述的兩大要點，卻導致中國論者對柯倫泰情慾思想產生偏頗認知。其一，林房雄用「戀愛遊戲」，來對譯柯倫泰提倡的「愛情演練」。默之的中文譯本，也沿用「戀愛遊戲」的字眼。由於中文的「遊戲」有嬉笑娛樂之意，「戀愛遊戲」讓人難免產生不認真看待情愛，輕浮不莊重的聯想。其二，林文歸結柯倫泰的戀愛觀，「一語可盡，曰『戀愛是私事』。」林房雄引用柯倫泰在《赤戀》1927年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話為證：「我以為，就一般論只要那人不踰越比較的寬大的某一定範圍，他的性生活，全只是他個人的私事。人的真價，不應由其家庭道德的行為上判別，是應視其事業，才能，意志，及其對於國家社會的有用性而決定的。」⁴³

林房雄一句「戀愛是私事」看似提綱挈領，實則簡化了柯倫泰論述的重點，並引導不少中國讀者對柯倫泰的戀愛觀，產生「性慾可依個人需求自由決定」的初步誤解。本文上一部分已說明柯倫泰闡述無產階級情慾觀的論文，明確表示戀愛與性皆非私事。她早於1911年的〈性關係與階級鬥爭〉，便曾批

⁴² 編者，〈新戀愛問題——徵求解答——〉，《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986。

⁴³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頁1033-1051。

判俄國社會虛偽地將性問題貶為「不值得集體努力和關注的『私事』領域」。⁴⁴到 1923 年的〈為有翼愛神開路！〉，柯倫泰更明言：「愛情絕非只是兩心相愛的『私密』現象，愛情對於集體來說是個具有約束力的珍貴原則。」⁴⁵柯倫泰的多篇論文，皆從群體大我出發來建構無產階級新道德，以此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自私道德。戀愛對她而言並非私事，而是以促進群體利益為目標的寶貴社會心理要素。

那麼，我們應如何解釋她在《赤戀》英文版序言中，乍似相反的論調？柯倫泰的《赤戀》也發表於 1923 年，當時她已被史達林外派為駐挪威公使與貿易代表。根據柯倫泰的傳記，《赤戀》乃她經歷破碎婚姻後的自我療傷之作，既訴盡她受過的背叛與創傷，也投射她的大愛理想。⁴⁶〈為有翼愛神開路！〉則發表於共青團機關報《青年守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展現向俄國青年宣揚健全的共產主義新性道德之意圖。綜觀柯倫泰各類作品，我認為應細分她闡釋情慾的公私性質及男女發展時的不同論述脈絡。當柯倫泰意圖建構共產主義新性道德時，戀愛與性都非僅關乎當事人的私事。因為愛情的多樣型態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新親密關係的面貌，性事更攸關優生與社會發展。而柯倫泰之所以在《赤戀》的英文版序言表達戀愛是私事的立場，用意在為新女性發聲。她表示，俄國社會向來對男女私領域行為抱持雙重標準。女子過去難在社會發展，僅被要求謹守家庭婚戀領域的良好美德，但如今俄國與世界各國女性陸續在社會大展長才。柯倫泰據此堅持戀愛與性關係，不應成為眾人評斷新女子社會價值的基礎。這般對女性的道德評斷，是「陳腐資產

⁴⁴ Alexandra Kollontai, "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239.

⁴⁵ Alexandra Kollontai, "Make Way for Winged Eros," 279.

⁴⁶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325-328.

階級的偽善」(old, bourgeois hypocrisy)，應被打破。⁴⁷柯倫泰唯有在強化輿論應重視新女性的社會貢獻時，才會表示戀愛是私領域行為，不應被干涉。換言之，柯倫泰所謂「戀愛是私事」，是獨從女性視角出發對抗男性本位社會偏見的呼聲。而若從柯倫泰欲建構的無產階級新道德來看，則戀愛與性都屬應裨益大我的「公事」。

由上可見，林房雄以「戀愛是私事」歸結柯倫泰的戀愛觀有失偏頗，甚且暴露他的男性本位思維僭據了柯倫泰為女性發聲的新道德立場，來為普遍(男)人性需求服務。林文雖參考柯倫泰其他論文並多處徵引柯倫泰之語，得出的論點卻不盡正確。⁴⁸一方面，他看似理解柯倫泰賦予戀愛的深刻見地，卻仍誤導讀者以蓋尼亞的表現代表柯倫泰的戀愛觀。另一方面，他說柯倫泰理想中的真愛有別於合法結婚、賣淫、自由戀愛乃至戀愛遊戲，卻又將柯倫泰形容為「感情主義的戀愛至上主義者」。⁴⁹林文充斥這些模稜兩可的觀點，且沒能掌握柯倫泰乃從集體的立場來重塑、界定戀愛。該文用「戀愛是私事」來概括柯倫泰的戀愛觀，尤其不利於中文讀者理解柯倫泰的真意。而章錫琛不明就裡，還在這場討論的開場白為林房雄文的權威背書。⁵⁰

無獨有偶，同樣加入「新戀愛問題」討論的高群逸枝之文，也從「戀愛是私事」的角度理解柯倫泰的作品；但她卻意在批評柯倫泰裝腔作勢的官僚戀愛觀。高群逸枝從「戀愛是私事」逕行推論柯倫泰也認定母性(愛)是私事，並強烈反對此二主張。高群氏以無政府女性主義者的身分，批評將戀愛與母

⁴⁷ Alexandra Kollontai,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Alexandra Kollontai, *Red Love* (New York: Seven Arts Publishing Co., 1927), online version from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red-love/ch00.htm>, 擷取日期：2024年4月14日。

⁴⁸ 林房雄確曾駁斥有人認為柯倫泰藉其小說，鼓吹「過渡期的淫蕩」男女關係。然而，林房雄顯然並未精確理解，柯倫泰實以建設集體無產階級性道德為核心，來開展其戀愛觀。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頁1033-1051。

⁴⁹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頁1046-1047。

⁵⁰ 章錫琛指出柯倫泰雖未在〈三代的戀愛〉表明自身戀愛觀，但林文「已經把她的意見說得十分明白了。」編者，〈新戀愛問題——徵求解答——〉，頁986。

性視為私事徒然不利於須承擔生育責任的女性。她同樣反感於柯倫泰的「戀愛遊戲」，指其不過是後者裝腔作勢的官僚味在作怪。⁵¹

林房雄與高群逸枝的評論文在「新戀愛問題」討論造成骨牌效應，引導中國讀者認識與回應〈三代的戀愛〉。十六位來稿者，只有朱梅一位女性；其中多位來自文藝出版界與知識教育界，如孫伏園(1894-1966)、陳醉雲(1895-1982)、孫福熙(1898-1962)與章克標(1900-2007)。這些思想多較開放左傾的知識人，對戀愛觀演變與柯倫泰思想各有其見解與不同衍申重點。但整體而言，此次討論展現出對柯倫泰戀愛觀的多重誤解。首先，來稿者多將蓋尼亞視為柯倫泰戀愛觀的代言人。他們在此前提下發表對蓋尼亞／柯倫泰戀愛觀的正反意見，並申論此種戀愛模式是否適用於當時中國。其次，他們都將「戀愛是私事」認定成柯倫泰的戀愛觀重點。多位來稿者受中／日文譯筆引導，都對柯倫泰主張的戀愛「遊戲」表示反感。⁵²再者，默之在翻譯林房雄文的譯註簡介柯倫泰時，指她「據說一生已經換過三十個丈夫了」。⁵³這個完全無憑證的「據說」也植入某些來稿者印象中，且日後繼續被某些民國論者不負責地接棒訛傳。⁵⁴

「新戀愛問題」討論雖未能正確掌握柯倫泰戀愛觀的核心真義，但參與者卻透過對〈三代的戀愛〉與兩篇日本評論的回應，呈現出北伐後有別於前期的情慾觀。不少投稿者肯定蓋尼亞式的性愛表現直接了當、不忸怩欺騙，自

⁵¹ 高群逸枝著，芳子譯，〈排官僚的戀愛論——關於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52-1058。

⁵² 洪鈞便批評戀愛遊戲「抹殺感情且違反自然律」。朱梅也指「遊戲」就是「玩弄」，聲言「我反對『人對於人』的論調！」洪鈞，〈六：『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頁1379-1383；朱梅，〈四：戀愛的現在與將來〉，頁1373-1376。

⁵³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頁1033。

⁵⁴ 例見洪鈞，〈六：『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頁1379-1383。

然且合情理。⁵⁵這些來稿男性不約而同，展現告別 1920 年代前期戀愛至上主義的論述面貌。經過數年的政治社會動盪後，思想激烈反傳統的青年有意再次突破既有的兩性關係桎梏。曾幾何時，戀愛是青年男女衝決禮教網羅的明燈；靈肉一致成為個性解放與身心結合的理想。一場大革命洗禮下，又讓不少弄潮兒企圖在民族大業中掙脫戀愛對人性本能的束縛。戀愛至上論，遭年輕論者批評為太神聖、過於虛無，不如遂乎男女本能情慾而為。

這場受跨國脈絡影響，對蓋尼亞的戀愛觀與性行為品頭論足的「新戀愛問題」討論，實充斥著男性本位的觀點。那些男論者立場雖有別，卻都借蓋尼亞的言行表達對男女膚淺地一視同仁的性愛觀。那是一種「我們男子能做什麼，你們女子也能做什麼」的立場，即忽略女性獨特生理心理條件，以男性為本位所開展的男女平等。他們無人關注身為女性的蓋尼亞，在(縱然是自願的)性關係後可能面臨身心的後果與傷害。蓋尼亞在他們的討論中，是以被抹除了女人生理性徵的中性存在。

這場討論唯一的來稿女性朱梅也誤解了柯倫泰的情慾思想，且未觸及女子在性事後果上的先天劣勢，但確展現她批評性愛二分的女性觀點。來自上海藝大的朱梅，開頭便反對柯倫泰「戀愛是遊戲」的論調。她顯然抱持自由主義的立場，批評那種戀愛遊戲論，「一點人的愛也沒有，這只有真正的 Marxist 才幹得出來。」⁵⁶朱梅顯然不認同貶低互尊互信情感的純性交關係；相對而言，許多男論者則不在意生理條件相合的性慾自由。朱梅點出革命男子打倒帝國主義的弦外之慾，也間接映照出左翼青年「革命的戀愛觀」本色。(詳後)

⁵⁵ 例見姚方仁，〈二：關於『三代戀愛』的分析觀察〉，《新女性》，第 3 卷第 12 號(上海，1928.12)，頁 1363-1370；靜遠，〈七：戀愛至上感的抹殺〉，《新女性》，第 3 卷第 12 號(上海，1928.12)，頁 1383-1390；安之，〈八：用相對性原理來應「新女性」九月號裏所徵求的關於新戀愛問題的解答〉，《新女性》，第 3 卷第 12 號(上海，1928.12)，頁 1390-1399；弋靈，〈十三：新戀愛問題關於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 3 卷第 12 號(上海，1928.12)，頁 1414-1419；波弟，〈十四：讀三代的戀愛後〉，《新女性》，第 3 卷第 12 號(上海，1928.12)，頁 1419-1422。

⁵⁶ 朱梅，〈四：戀愛的現在與將來〉，頁 1373-1376。

綜觀《新女性》的「新戀愛問題」討論對性與愛分合的觀點走向，參與者雖多仍承認戀愛存在的必要性，卻共同卸除了戀愛的光環。某些來稿還揭露當時中國雖連〈三代的戀愛〉祖母輩的自由戀愛觀也難以普及，某些青年男女卻早已實踐蓋尼亞式的性交自由。孫福熙的來稿便藉一對男女的對話，表述像蓋尼亞那般「絕對自由的男女結合，總有一天會到來的，多少人在暗中實行的不算，至少你我是在開始享受這幸福了。」⁵⁷

孫福熙所言，透露類似蓋尼亞式的性交自由在中國社會已是進行式。確實，早在北伐前，中共黨內即已存在跨國渾沌的男女戀愛風波。赴法勤工儉學、赴俄學習深造，以及在華進行黨工的中共成員，交織出各色婚戀分合關係。下一節將把這些情慾實踐與早期有關柯倫泰的中文譯介，共置於北伐前後左翼文化演變的脈絡下，進行整體考察。

四、從迎到拒蓋尼亞：重新定位柯倫泰理想女型

1920年代的左翼陣營主要由信奉廣義的社會主義人士所組成，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及中共或其同情者。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1924-1927)，不少中共成員自願或被派赴蘇俄學習，由此接觸蘇共理論與言行。這些青年男女日後對柯倫泰作品的理解，是在受蘇共影響的脈絡下展開的。但中共成員的情慾表現，卻不待柯倫泰啟蒙便行展開。陳碧蘭(1902-1987)與鄭超麟(1901-1998)這兩位後來成為托派的早期中共黨員，日後都曾憶述1920年代黨內同志的多角愛恨情仇。⁵⁸自1928年起，中共成員夏衍等人，才開始密集譯介柯倫泰的戀愛、女性及性道德作品。與此同時，中共成員主導的革命文學運動，自上海沸沸揚揚展開。然而進入1930年代，中共力量介入導致左翼文學轉向，輿論對柯倫泰戀愛觀的評論也出現變異。

⁵⁷ 孫福熙，〈十：三代的戀愛的二人的談話〉，《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401-1406。另見伏園，〈九：我們將有自己的三代的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99-1400。

⁵⁸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20-401；鄭超麟，《史學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1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283-299。

本節將梳理上述歷史脈絡，析論中國左翼陣營在北伐後幾年間譯介柯倫泰情慾作品的特色及演變。藉此，我將辨識左翼轉型期間男性文青借柯倫泰作品表述的情慾及兩性觀，並說明政治力量如何主導左翼陣營對柯倫泰／蓋尼亞戀愛觀重新定位。所謂左翼轉型期，乃 1928 到 1930 年代前期以上海文壇為中心，從國共分裂後誕生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後的演變過程。此一轉型期的誕生源於五四後，中國國內外政治社會情勢及意識型態的變化。1917 年俄國大革命引發的國際震盪，對中國日後政局與思想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到 1920 年代中期的北伐階段，國共動員大批青年學子與工人投身革命。革命大業與個人戀情如何兼顧或取捨，成為眾青年男女關注焦點。⁵⁹幾乎同時，圍繞中共陣營的左翼文人嶄露後來被稱為「革命加戀愛」的創作模式，並迅速蔚為風潮。⁶⁰此種革命文學型態，反映出戀愛問題討論受大環境影響的演變趨勢。原先以擺脫家庭禮教束縛、強調個人自覺自主的戀愛觀，此時受到革命大我與性慾本能的夾擊。

經歷過北伐激進思潮洗禮的新儒家大師牟宗三(1909-1995)，以「大浪漫時代」來形容北伐到左翼文化轉型期的「放縱恣肆」精神特質。⁶¹牟宗三在《五十自述》對大革命時代思想特質的省思，有助於我們想像柯倫泰的小說進入的是怎樣的中文語境。他將當時中共的言行與道德思想，形容為「絕對的粗獷的唯物論」。此意指中共黨人批判資產階級、打倒傳統教化之舉，並非個人道德自覺的內在覺悟錘煉，而是政治理想與政黨行動允許放任的結果。⁶²

⁵⁹ 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73-102；熊權，〈論時代思潮中的“戀愛與革命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3 期（北京，2015），頁 95-105。

⁶⁰ Jianmei Liu,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44-71; 熊權，《革命加戀愛現象與左翼文學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8-14。

⁶¹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鵝湖出版，1993），頁 32。我非常感謝劉季倫老師提點我此一史料。

⁶² 牟宗三，《五十自述》，頁 31-33。

曾是弄潮兒的牟宗三日後作為局外人的觀察，折射出北伐前後席捲中國社會變動能量之強大。

這種改變現狀的動能也衝擊時人對戀愛的思考與實踐，而辯證地挑戰了 1920 年代前期風靡進步思想界的戀愛自由。一方面，戀愛原被賦予的神聖性，在政黨運動與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漸失光環。他方面，即便革命者也承認實踐大我之際無法完全壓抑本能；某些激進青年轉而主張解放性慾出戀愛的束縛。許多左翼文人透過柯倫泰作品，重思性、愛及道德互涉以及新女性面對自身與社會解放的表現。他們依據的論述標準，是 1928 年揭開左翼轉型期序幕的革命文學意識形態。

柯倫泰情慾作品的重要譯介者夏衍(1900-1995)，便參與見證了這段中共及其同路人共同促成的革命文學轉向。夏衍在留日時，加入國共合作階段的國民黨；當國共合作破裂後回到上海，轉加入共產黨。那時的他發現自己所屬的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及其他支部，「都是從前線和日本轉移到上海的文化工作者」。「因此，從 1927 年底到 1929 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主要是從閘北支部掀起來的。」⁶³

夏衍的記述說明四一二政變後，中共在上海的勢力並未消失；毋寧，應說出現了某種質變。中共原先在上海，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策畫並進行工人運動。經歷了近一年夏衍所謂「血腥的白色恐怖」，中共在上海的活動型態反趨多元。其中，由「各地轉移到上海的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領銜推動了普羅革命文學運動。⁶⁴夏衍則一邊為中共進行宣傳工作，一邊為開明書店翻譯各類外國社會主義作品。⁶⁵1928 年，他以沈端先的筆名陸續譯出柯倫泰幾部重要的情慾著作。

⁶³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頁 85-86。

⁶⁴ 夏衍表示，到 1928 年春夏之交，上海某些工會及黨組織重新設立，也成立某些工人俱樂部與工人夜校。包括他在內的黨員，甚至與好幾所大學人士交流，並建立黨支部及小組。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頁 85-89。

⁶⁵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頁 87-88。

從上海掀起的普羅革命文學浪潮，強化了大革命期間已經存在的戀愛階級化，使左翼陣營普遍以此種意識形態來定位柯倫泰／蓋尼亞戀愛觀。北伐階段隨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擴散，戀愛漸被某些男無政府主義者與共黨青年賦予階級特性。在他們眼中，五四以降宣揚的戀愛成了「小資產階級」有錢有閒的產物。⁶⁶話雖如此，中共黨內血氣方剛、熱切激進的男女仍遏抑不住情慾，戀愛與革命熱情交纏不清。其中，尤其男同志樂於發揮青澀的唯物論觀點，主張用身體的生理需求來主導心靈的情愛感受。蓋尼亞為了革命工作無暇談情說愛的自由性慾表現，卻讓這些中國青年直接對號入座。他們將蓋尼亞的言行嫁接到自己宣揚或實踐的無產階級戀愛觀，以合理化自身的信仰與思想行徑。當夏衍等人翻譯柯倫泰的小說後，蓋尼亞挑戰小資產階級的性關係，便被左翼作家陸續據之發揮來描繪革命大愛與小我私情糾葛。

在眾多革命與戀愛子題交織出「革命的浪漫諦克」創作中，明顯可見受柯倫泰情慾作品影響的痕跡。⁶⁷這些中國作家發揮其所認知的柯倫泰精神，強調革命至上、批判以往戀愛的資產階級劣性，並追求性慾解放。這類創作，包括茅盾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與《追求》，1927-1928)、《野薔薇》短篇小說集(1929)、《虹》(1930)，以及蔣光慈(1901-1931)的《衝出雲圍的月亮》(1930)等。⁶⁸

胡也頻(1903-1931)出版於1930年的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更出現討論〈三代的戀愛〉情節。該小說描述女主素裳出身優渥且丈夫為黨國要人，卻在遇見階級懸殊且為共黨獻身的洵白後，思想情感與人生志向都出現重大改變。《到莫斯科去》開場，眾人齊聚素裳女士美侖美奐的家中，為她慶生。當中，她同性友人夏克英談起「柯倫泰夫人的三代戀愛問題」以及「性的完

⁶⁶ 鄭超麟，《史學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頁283-299。

⁶⁷ 關於當時左翼陣營出現「革命的浪漫諦克」現象，見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87-127。

⁶⁸ 方維保，〈柯倫泰夫人小說的譯介與中國“紅色羅曼諦克”的創作〉，《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南京，2019.09)，頁144-152；高俊傑，〈「革命加戀愛」主題下的革命女性：以柯倫泰作為方法的茅盾及蔣光慈小說〉，收入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20)，頁207-246。

全解放」；夏轉問素裳對此問題的看法。素裳先笑回：「你還問做什麼呢？你自己不是早就實行了麼？也許你已經做過第四代的——所以柯倫泰的三代戀愛在你是不成問題了。」後來，她表示自己的看法：「誰願意怎樣就怎樣。在戀愛和性交的觀念上，就是一個人，也常常有變更的：最好是自己覺得是對的便做去好了。」⁶⁹胡也頻藉此對話，表達對情慾的兩種意涵。一方面，他透露當時中國青年男女，早已實踐不受既有性道德約束的情慾行為。另一方面，他也暗批未受革命思想啟蒙前的素裳，那種僅依自我判斷行事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1928 到 1930 年間，左翼文青透過各類譯介與文藝創作，共同將柯倫泰烘托為替新戀愛之道指路的共產主義明燈。1928 年底，夏衍以沈端先之名出版《戀愛之路》，包括他所譯柯倫泰〈三代的戀愛〉與〈姊妹〉兩篇小說。由夏衍的譯者序，可知他與柯倫泰有書信往來；柯倫泰還鼓勵他譯出《赤戀》。⁷⁰ 1929 與 1930 年，柯倫泰的小說〈赤戀〉及〈偉大的戀愛〉各有多家出版社的中譯本。⁷¹非小說文類，有 1929 年出版的《戀愛與新道德》論文集。柯倫泰的〈新婦人〉及〈婦女與家庭制度〉中譯版，則刊登於《新女性》。⁷²《戀愛與新道德》由夏衍與汪馥泉根據林房雄的日文版翻譯，收錄〈新婦人〉與〈為有翼愛神開路！〉等五篇論文。該書「譯者的話」總結論文集的柯倫泰作品，即為建設無產階級戀愛道德的努力的成果。⁷³

⁶⁹ 胡也頻，《到莫斯科去》（上海：光華書局，1930），頁 4-5。

⁷⁰ 沈端先，〈譯者贅言〉，收入柯倫泰著，沈端先譯，《戀愛之路》（上海：作新書社，1928），頁 4-6。夏衍在〈譯者贅言〉中，以《紅戀》來指涉《赤戀》。但為求不讓讀者混淆，我在正文統一以《赤戀》示之。

⁷¹ 見柯倫泰著，溫生民譯，《戀愛之道》（上海：啟智書局，1929）；柯倫泰著，溫生民譯，《赤戀》（上海：啟智書局，1929）；柯崙泰著，楊騷譯，《赤戀》（上海：北新書局，1929）；柯倫泰著，周起應譯，《偉大的戀愛》（上海：水沫書店，1930）；柯倫泰著，李蘭譯，《偉大的戀愛》（上海：現代書局，1930）。

⁷² 柯倫泰著，沈端先、汪馥泉譯，《戀愛與新道德》（上海：北新書局，1929）；柯倫泰著，沈端先譯，〈新婦人〉，《新女性》，第 4 卷第 1 期（上海，1929.01），頁 1-51；柯倫泰著，陶父譯，〈婦女與家庭制度〉，《新女性》，第 4 卷第 8 期（上海，1929.08），頁 32-50。

⁷³ 沈端先、汪馥泉，〈譯者的話〉，《戀愛與新道德》，頁 4。

柯倫泰情慾作品在 1929 與 1930 兩年間的中文譯介，迎來另一個新革命女性典範，即《赤戀》的女主角華茜麗莎。雖然《新女性》那篇林房雄譯文中的「戀愛是私事」概念來自《赤戀》，但林文並未介紹華茜麗莎。《赤戀》描寫女革命家華茜麗莎面對思想逐漸墮落甚至出軌的丈夫，從痛苦懷疑、拒絕接受，到面對現實的經歷。華茜麗莎雖愛戀丈夫，卻不忘工作與社會本分，自己雖懷孕卻決定離開丈夫，成全他與其情人。她回到原先住的公共住宅，與意氣相合的女同志投入社會與婦女解放工作，並規劃共同撫養小孩。華茜麗莎與蓋尼亞，皆屬置革命大業於個人私情之上的工人階級女性。溫生民以《戀愛之道》與《赤戀》譯者身分所寫的序，顯現出肯定華茜麗莎的態度。⁷⁴

華茜麗莎與蓋尼亞兩個異質形象的並存，雖豐富民國時人對柯倫泰情慾思想的理解想像，卻使其戀愛觀的面貌更複雜難辨。蓋尼亞與華茜麗莎基本上展現出相反的性愛觀。蓋尼亞毫不介意為了工作，有性無愛；華茜麗莎則追求有靈有肉的性愛。若從柯倫泰思想觀之，則華茜麗莎屬於柯倫泰期許的蘇俄新女性，蓋尼亞只是反映內戰期間性混亂關係的女青年。但當時中國左翼文人，並未清楚掌握柯倫泰企圖宣揚的無產階級新性道德面貌。這些男青年仍以蓋尼亞來代表他們肯定的無產階級戀愛表現：即工作至上，性事照行。

約自 1930 年起，左翼陣營對柯倫泰／蓋尼亞戀愛觀的論述，因中共介入促成的左聯誕生，而出現重要變化。夏衍同時身為柯倫泰譯介者與左聯主要籌備人，其言論頗能說明此一轉變。⁷⁵1930 年 3 月 2 日，左聯在夏衍形容為「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上海，秘密舉行成立大會。左聯的成立終結了前兩年熱鬧內鬨的革命文學爭執，使左翼陣營的文藝創作及論述出現轉向。左聯主張「現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應該拋去包括「戀愛和革命的衝突」

⁷⁴ 溫生民，〈譯序〉，收入柯倫泰著，溫生民譯，《戀愛之道》，頁 1-2；溫生民，〈譯序〉，收入柯倫泰著，溫生民譯，《赤戀》，頁 1-3。

⁷⁵ 夏衍解釋道：「由於 1928 到 1929 年，一方面是贛、粵、閩一代工農紅軍和國民黨戰爭正酣，中間還有大部分領導人到莫斯科去參加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反對陳獨秀、托洛茨基的鬥爭也很劇烈，所以據我記憶，文藝界的問題似乎還排不上黨的重要議事日程，因此，文藝論爭開始，黨中央似乎沒有予以重視。黨中央干預和解決這場論戰，在我記憶中，開始於 1929 年的初秋，也就是決定籌備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前夕。」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頁 93-94。

在內的「定型的觀念的虛偽的題材」。⁷⁶此前數年所盛行「革命的浪漫諦克」現象，瞬間在左翼陣營變得政治不正確。

夏衍接下代表左聯批判「戀愛加革命」思想與創作模式的任務。他在 1930 年一篇針砭蘇聯性文學的評論，關鍵標示出中國左翼文壇從揚到棄柯倫泰／蓋尼亞戀愛觀的分水嶺。這篇題為〈「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之文，刊於左聯成員合撰的《文藝講座》第一冊。如今的夏衍，明確尊列寧之見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性愛問題的立場」。⁷⁷他長篇引述列寧與蔡特金那段著名對話，以重估柯倫泰小說的價值。柯倫泰筆下的蓋尼亞，被夏衍界定為「祇是革命過程中間的少數前衛分子適合於當時客觀條件而遂行著的非常態的性的活動，而決不是表明著新興普洛塔利亞階級對於性愛問題的理想。」⁷⁸夏衍對柯倫泰〈三代的戀愛〉及處理類似主題的其他蘇聯小說，做了整體批判。⁷⁹

從 1928 年底《新女性》的「新戀愛問題」到 1930 年夏衍之文，見證了一連串柯倫泰在跨國多文化三重脈絡下被誤解，且對蓋尼亞從揚到棄的論述過程。1930 年代後，蓋尼亞式的戀愛觀不再像前兩三年曾受諸多左翼論者青睞，而是遭到各方圍剿。與此同時，1930 年也可謂開啟中國社會將柯倫泰的戀愛觀認知為一杯水主義的關鍵時刻。但這並不表示，此後中國的一杯水主義論述皆與柯倫泰有關。這也不表示柯倫泰思想在中國，只代表一杯水主義。本文最後兩節，將先梳理柯倫泰與一杯水主義的關係，再說明時人如何超越一杯水主義的框架，來理解與發揮柯倫泰思想。

⁷⁶ 馮雪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文學導報》，第 1 卷第 8 期(上海，1931.11)，頁 2-7。

⁷⁷ 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文藝講座》第 1 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頁 289-296。

⁷⁸ 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頁 293。

⁷⁹ 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頁 295。

五、柯倫泰與一杯水主義的掛勾與脫鉤

陳相因曾闡述一杯水主義於 20 世紀初多國語境傳衍之際，在中國如何被等同於柯倫泰主義。但她的論文重點，不在呈現柯倫泰與一杯水主義在華的關係演變過程。本節希望在陳文基礎上，進一步梳理此二者在 1930 到 1940 年代民國社會的互動，以更全盤掌握柯倫泰在華的影響。

前述夏衍發表於《文藝講座》第一冊的那篇 1930 年論文，應屬中國左聯文壇首次援列寧之見，將柯倫泰／蓋尼亞戀愛觀與一杯水主義掛勾。⁸⁰該文指出列寧的主張雖似有清教徒禁慾主義傾向，卻是教化青年「絕對正確的指導意見。」夏衍發揮列寧論點，表示：「普通人大概能夠忍受一刻的口渴，大概能夠拒絕合用的杯子，這一點，是充分足以答覆『蓋尼亞傾向』的青年的。」文章末尾，夏衍指出《三代的戀愛》等小說所描述的時代，在蘇聯已然結束。他並以「在中國，我也希望不再有這種『一杯水』的『理論』(?)」，為該文畫下句點。⁸¹

自 1930 年後，中國左聯語境從列寧主導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脈絡出發，認定柯倫泰(及其蓋尼亞)為一杯水主義代言人。在那之前，柯倫泰的中文譯介者雖咸以蓋尼亞的言行代表柯倫泰的戀愛觀，卻尚未直接將之與一杯水主義掛鉤。1928 年《新女性》「新戀愛問題」的討論，並沒有出現一杯水主義的字眼。而 1930 年後，柯倫泰便在左聯陣營循列寧的政治正確路線後，被認知且批判為提倡一杯水主義的宗師。

由上節可知，北伐之前即不乏中國青年男女在國內外實踐性愛自由之例。五四之後，學校、學生團體及政黨組織都成為知識青年男女擺脫家庭權威、思想與情感交流，乃至於情慾結合的某種舒適圈。自願或被黨派赴海外學習者更擺脫了國外道德高壓的束縛，情感較易奔放。不過，目前仍未有史

⁸⁰ 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頁 1-41。

⁸¹ 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頁 295。此句尾的「(?)」，乃原文所有。

料直接證明赴俄進修或從事黨工的中共成員之情慾表現，確實受柯倫泰著作的啟發。

陳碧蘭寫於 1954 年的回憶錄，看似最足以證明中共成員在北伐前與柯倫泰著作的關聯；實則不然。陳碧蘭在回憶錄用一則長註，說明她對一杯水主義與柯倫泰關聯的(錯誤)認知印象：

陳喬年所說的兩性關係像「喝一杯水一樣」，這也許是從俄國女革命家兼作家柯倫泰而來。當時我不知道，及至回國後幾年，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我看到柯倫泰著的小說，書名為《三代戀愛》。在這部文藝作品中，她描寫母女二代的戀愛關係，——母親和女兒均為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女兒和母親的愛人發生了性的關係，當她的母親責備她時，她說：「由於工作的地點調換了，一時找不到對象，為了性的需要和便利，同你的愛人發生了關係，沒有甚麼了不起，像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樣。」這便是柯倫泰的戀愛觀，她認為在革命之後，性的關係也解放了，第二代比第一代更解放，這便意味著第三代將比第二代更解放，她的書名為三代戀愛，也許由此而來。因此，一杯水的戀愛論，在二三十年代，那些前進的知識分子中傳得很普遍，但實行這種理論的卻很少見，甚至連陳喬年本人於一九二六年就放棄了這種主張，而實行戀愛了。因大家都傳說，列寧(Lenin)曾嚴厲地批評柯倫泰的一杯水戀愛觀，列寧既然把這個問題當作一種傾向來反對，可見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男女青年受柯倫泰影響的不少。約在一九三五五年左右，當我讀了列寧夫人克魯潑斯卡亞所著《列寧回憶錄》一書之後，我才知道所傳列寧反對一杯水戀愛觀確是事實，書中曾描述這一事。柯倫泰的戀愛觀，也同她的政治思想一樣，是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思想。⁸²(文中畫底線處，為我的強調)

陳碧蘭這段充滿訛見且邏輯怪異的附註，對柯倫泰的評論幾可用「不負責任」來形容。該註用來證明柯倫泰提倡一杯水主義的蓋尼亞之語，乃無中生有，因為〈三代的戀愛〉找不到這段對話。陳碧蘭在錯誤詮釋小說的「三代」之意後，立刻說「因此，一杯水的戀愛論，在二三十年代，那些前進的

⁸² 陳碧蘭，《我的回憶》，頁 138。

知識分子中傳得很普遍」。此番行文，讓人無法理解，這個一杯水的普遍現象，與〈三代的戀愛〉究竟何干。陳碧蘭接著陳述，「大家都傳說」列寧曾厲批「柯倫泰的一杯水戀愛觀」。然而，她並未解釋中共成員何時得知列寧反對柯倫泰的一杯水戀愛觀。此後，她又對柯倫泰的戀愛觀，做出「無政府自由思想」此一不正確的蓋棺論定。

陳碧蘭的憶述與註釋，實無法確證中共黨員在 1930 年前已將柯倫泰認知為一杯水主義的代言人。倒是，這份回憶錄史料確認 1930 年代後，左翼人士接收了列寧反對(柯倫泰)一杯水戀愛觀的訊息。比較合理的推測，是 1920 年代的左派青年先實踐自由情慾，之後才發揮柯倫泰學說以合理化自身的行為想法。總之，1930 年後，左聯對蓋尼亞式戀愛觀展開批判，而在中國社會相應催生出具一杯水主義負面意涵的「柯倫泰主義」。⁸³

但與此同時，遠在內陸的江西與陝北蘇區紅軍，卻以行動取代文字，以自由隨性的情慾關係，來落實被認定為柯倫泰代言的一杯水主義。蔡孝乾(1906-1982)這位唯一參加過中共長征的台灣人，日後曾憶述柯倫泰對蘇區的影響。他在已投誠國民黨十餘年後的 1960 年代末，寫下回憶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⁸⁴其中一章論及「蘇區的男女關係」，有一小節標為「柯倫泰女士『自由戀愛』的流毒」。蔡孝乾敘述他從江西蘇區到陝北蘇區，都發現眾多「奇妙的、混亂的男女關係」。他說明中共蘇維埃仿效蘇共法律制定的《婚姻條例》，從江西一路帶到陝北蘇區開啟了性的解放，破壞善良純樸民風。他將矛頭指向柯倫泰，把那些中國農村地區男女婚姻內外湧現的性混亂關係，都歸咎於她：

這裡，我想用不著詳細敘述蘇聯新婚姻制度或所謂共產主義婚姻理論的具體內容；我們只要指出把「一杯水主義」的婚姻觀念帶進江西蘇

⁸³ 例見駱劍冰，〈柯倫泰主義與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生存月刊》，第 4 卷第 4 期(上海，1933.08)，頁 86-89；〈所謂柯倫泰主義的戀愛觀及其批評〉，《玲瓏》，第 5 卷第 36 期(上海，1935.09)，頁 2377-2378。

⁸⁴ 關於蔡孝乾的生平，見葉翔之，〈序〉，收入蔡孝乾，《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2002)，頁 5-6；林威杰，〈共產黨人的道路抉擇：蔡孝乾的「叛變」與轉變〉，《東吳歷史學報》，第 41 期(臺北，2021.12)，頁 91-139。

區的幾個留俄幹部之間所表演的幾樁富於羅曼蒂克情調的自由戀愛故事就夠了。

依我在江西蘇區(一九三二—三四年)所看到的一些典型例子(前面已敘述)，足以證明當時中內部「一杯水主義」男女關係的盛行，顯然是柯崙泰女士「自由戀愛」的流毒所使然。……中共在其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關係，同樣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⁸⁵

撇開蔡孝乾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評語，他的敘述揭露了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對柯倫泰戀愛觀(即一杯水主義)的接受存在地區差異。蔡孝乾的回憶錄寫於他背棄中共之後，因此文中批評江西與陝北蘇區破壞中國傳統道德之語，自然有追求政治正確之意。但他對柯倫泰的評述，卻得以提供吾人想像國民黨政權控制外的中共蘇區，如何實踐類似俄國革命後的性解放。當左聯開始打擊「革命的浪漫諦克」現象後，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陣營大致已不續唱柯倫泰的性解放論調。蔡孝乾對兩地蘇區男女關係的描述，卻反映(他所認知的)柯倫泰戀愛觀的影響，可能仍持續於 1930 年代中國某些地區。

根據蔡孝乾的描繪，江西及陝北蘇區在 1930 年代前中期的混亂性關係，猶如俄國內戰時期性失序的延遲再現。他則理所當然，將柯倫泰視為這種一杯水關係的代言人。但事實上，蔡孝乾並未提供任何江西與陝北蘇區紅軍成員是否傳播柯倫泰思想的線索。他只暗示這種「一杯水主義」的婚姻觀念，是由「幾個留俄幹部」帶入江西蘇區。這並無法證明那些中共成員在俄國時，確實接收柯倫泰的戀愛觀。柯倫泰筆下蓋尼亞的情慾表現，是反映而非啟動俄國青年男女內戰時的性關係。同理，留俄時期或兩地蘇區的中共性關係，很可能是對俄國的性解放有樣學樣。在紅軍對抗國軍、草木皆兵的動盪階段，唯物論特別容易被膚淺理解，性慾也特別容易被視為釋放緊繃壓力的捷徑。柯倫泰在長征前後的蘇區，或許只是某種紅軍縱慾的思想藉口。不過，由於柯倫泰的戀愛觀與無產階級情慾思想，確可能威脅列寧史達林等男領袖想維護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因此總是持續被誤解為主張性開放。

⁸⁵ 蔡孝乾，《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頁 159-160。

回到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出版界；抗戰後，柯倫泰與一杯水主義的關係反趨鬆弛，不復之前那般緊密相依。在蘇聯生活過一年的潘天覺，於 1942 年某篇憶述文提及一杯水主義與柯倫泰。但他是這麼說的：「蘇聯的男女關係現在是正常化，家庭穩定化，不但以前列寧所提出的『一杯水』主義和科倫泰夫人『三代戀愛』的故事已完全過時，不為人所贊同。」⁸⁶不知情者，或者竟會誤以為是列寧在提倡一杯水主義！1946 年，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李鐵民（1898-1956），在〈蘇聯青年男女的性道德標準〉複製了 1930 年夏衍文的論點。李鐵民依著他所謂「蘇聯的革命聖人列寧」之見，來批評柯倫泰的蓋尼亞戀愛觀。⁸⁷然而，1940 年代其他言論，並不都將柯倫泰（主義）等同於一杯水主義。此可見於「樂天」於 1941 年在上海《自修》週刊對「柯倫泰主義」的詮釋：「柯倫泰主義，即俄國柯倫泰女士(Alexander M. Kollontai)的新戀愛論，其大意为：(一)戀愛性生活與結婚，絕對為兩性自願的事，只要一方提議解除性愛關係，即立時斷絕關係，不受任何拘束；(二)性生活完全是私生活，應與公生活明確區別，獨立起來。」⁸⁸至少就字面來看，樂天界定的「柯倫泰主義」與一杯水主義沒有掛鉤。而觀諸其內容，則凸顯了早期中國譯介者強調「戀愛是私事」與情慾自由的意涵。

其他戰時及戰後提及一杯水主義的言論，成為國共論者各依自身意識形態交相批判的陣地，而鮮少提及柯倫泰。原則上，國民黨支持者常控訴共產黨公妻、亂交，即營一杯水主義的混亂性關係。中共及其同情者則開始努力與一杯水主義劃清界線，反批國民黨散播謠言。這類文章主題，包括介紹蘇聯兩性關係情形、國共互相批判、評論戀愛以及社會新聞報導。作者群對一

⁸⁶ 潘天覺，〈在蘇聯一年(十)〉，《民國日報贛南版》(贛縣)，1942 年 2 月 13 日，3 版。

⁸⁷ 李鐵民，〈蘇聯青年男女的性道德標準〉，《真理與自由》，第 3 期(上海，1946.01)，頁 19-21。

⁸⁸ 樂天，〈名詞淺釋：柯倫泰主義〉，《自修》，第 188 期(上海，1941.10)，頁 8。

杯水主義的來源缺乏共識，且不常溯及柯倫泰。⁸⁹綜言之，當時國共陣營都在跟一杯水主義劃清界線；柯倫泰反較未被輿論流彈波及。

直到國共內戰尾聲，柯倫泰似乎再度被認定須為一杯水主義負責。睽違多年，1949年的中文世界又出現數起將柯倫泰與一杯水主義勾連之作。⁹⁰此或許與當時中共勢興，蘇共主流觀點普及有關，因此又援列寧之見來批評柯倫泰及其一杯水主義。此後，直至21世紀的當代，國際社會持續人云亦云，公認柯倫泰為一杯水主義／理論創始人。只剩嚴肅對待柯倫泰的研究者，會為她喊冤。⁹¹

1930年代前半葉，柯倫泰戀愛觀與一杯水主義在蘇共與中共的跨文化脈絡下，產生了緊密結合；但這並非柯倫泰思想在戰前中國發展的全貌。轉變中的民國政治與社會環境，促使仍關注情慾及女性問題的論者從柯倫泰著作汲取能量，發揮新觀點。她在《赤戀》中刻畫的華茜麗莎，躍為抗戰前後某些左派女青年追求女性新人生的理想典範。這些譯述，賦予柯倫泰(主義)在中國獨立於一杯水主義的不同面貌。本文最後一節將揭示1930年代後，柯倫泰的中文譯介所展現的新生命。

六、「事業大於戀愛」：抗戰前後中國女性詮釋的柯倫泰新女型

1930年代初，隨著大革命熱情喧囂的氛圍散去，國共鬥爭進入武裝對立與意識形態競爭的新階段，中國社會對柯倫泰的接受也相應出現變化。北伐

⁸⁹ 陶景元，〈蘇聯的風景線〉，《民國日報江西版》(南昌)，1942年3月1日，4版；〈三種戀愛觀〉，《民國日報贛南版》(贛縣)，1943年11月2日，1版；酒泉，〈「公妻」的謠言與列寧的戀愛觀〉，《大公報香港版》(香港)，1949年5月24日，第2張8版。

⁹⁰ 孫起孟、孫蘊，《戀愛觀與戀愛藝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49)，頁51-56；V. 斯維得洛夫著，常樂生譯，《新家庭論》(無錫：新華書店，1949)，頁53。

⁹¹ 除了前引陳相因的著作之外，美國俄國史專家理查德·斯蒂特斯(1931-2010)便曾言，只要仔細閱讀柯倫泰的情慾與女性相關住述，就可以輕易吹散那些將她認同為一杯水主義始祖、或以蓋尼亞的性表現來代表其戀愛觀的種種迷霧。見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357.

後的中國名義上由國民黨統一，施行訓政。國民黨援引儒家思想來建立穩定社會、端正風氣的官方意識形態；上個年代的革命解放風氣不再。但這並不表示中國論者就此遺忘柯倫泰。

本節集中檢視抗戰前後的 1930 到 1940 年代，中國知識女性如何讓柯倫泰著作這個外來資源為己所用以申揚女權。我們將看到，此階段譯介柯倫泰的女論者展現兩大特色。一是，她們多將柯倫泰的戀愛觀與蓋尼亞脫鉤，批判蓋尼亞卻迴護柯倫泰的思想。二是，她們著意發揮柯倫泰不以戀愛情慾、而以社會表現為重的女性解放論點。這些中國知識女性以柯倫泰的〈赤戀〉女主的表現為基礎，發展「事業大於戀愛」的口號，來強化她們重視公領域發展的女權見解。然而微妙的是，這些左翼女文青強調女性的公領域表現並淡化其戀愛生活的言論，卻未見脫離男性本位的大敘事框架。

1930 年代之後中國評述柯倫泰主義的主要走向，當屬對蓋尼亞式戀愛觀的批判。此階段不論肯定或批判柯倫泰主義之人，都揚棄前兩年中國不少左翼知青曾表認同的蓋尼亞式性慾自由觀。當時仍支持柯倫泰主義的中國論者，不再把蓋尼亞視為柯倫泰戀愛觀的代言人。較典型的作品，乃 1931 年李君毅以〈從愛倫凱到柯倫泰〉為題之文。她明確表示華茜麗莎，才是「柯倫泰真正的理想女性模型」。⁹²在李君毅看來，蓋尼亞「屬於革命後所謂亂婚時期的女性」，其戀愛觀並不健全。相形之下，華茜麗莎才真正體現柯倫泰的戀愛與新女性觀。華茜麗莎「也戀愛，然而戀愛幻滅時，不，即在戀愛中，她也不忘記自己的工作。」⁹³藉由置換柯倫泰主義的代言人，李君毅重新估定柯倫泰的情慾思想核心。原先被傳播的柯倫泰主義，以一杯水意涵的性愛模式為重點。如今，李君毅希望強調華茜麗莎做為革命家與新女性典範的形象，來為柯倫泰主義正名。

李君毅以柯倫泰的華茜麗莎作為時代新女性典範的立場，大致預示了其後眾女論者對柯倫泰主義的重新定位。⁹⁴北伐後譯述柯倫泰的中國女作者，

⁹² 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婦女雜誌》，第 17 卷第 7 期(上海，1931.07)，頁 135。李文將華茜麗莎稱為「瓦絲利莎」。但為求與其他文章統一，以避免引起閱讀混淆，此處仍以華茜麗莎示之。

⁹³ 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頁 135。

⁹⁴ 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頁 135。

不論政治立場偏國民黨或共產黨，都從社會(福利)主義視角來討論女性的發展及未來。當時許多專業女性希望透過推播蘇聯較進步的婚戀法律、兩性關係、婦女發展與社會福利，刺激國民政府效尤。柯倫泰在這波介紹蘇聯社會的浪潮中，再次被推到浪尖。論者推崇她自俄國大革命前，就已力倡男女全面平等與婦女徹底解放，更在擔任政府公職之後，推動各項立法落實其主張。⁹⁵

抗戰前數年，在幾位女論者對柯倫泰的譯述中，浮現出「事業大於戀愛」的新女性理型。巧合的是，一如林房雄在北伐後以「戀愛是私事」主導《新女性》讀者討論戀愛問題，此次也是由日本學者首以「事業大於戀愛」，來重新勾勒柯倫泰的戀愛觀。1934年，沈茲九，梅格與青玉這三位女論者，不約而同翻譯了早稻田大學教授秋田雨雀(1883-1962)對柯倫泰其人其思的評述。⁹⁶秋田氏曾於1927年，在莫斯科與柯倫泰有過二度短暫晤談的機會。他盛讚柯倫泰是徹底的男女同權論者，並強調她的婦女解放論是立於近代人類學與社會學基礎而發。此文對柯倫泰的戀愛情慾觀，批評推崇兼有之。首先，秋田氏依蘇聯官方報導及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柯倫泰所倡「同志愛」持保留看法。其次，秋田雨雀以「事業大於戀愛」的概念歸結柯倫泰思想的論點，並推崇此為她的偉大發現。秋田雨雀肯定柯倫泰相關的小說創作，批判戀愛無謂的神秘及被過度重視。

⁹⁵ 例如柯倫泰著，辛如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與婦女勞動〉，《女子月刊》，第4卷第11期(上海，1936.11)，頁22-29；A. 柯倫泰著，蓓蓓譯，〈蘇維埃婦女是有完全權利的公民〉，《中蘇文化雜誌》，第18卷第3期(南京，1947.03)，頁3-6。

⁹⁶ 誠然，夏衍在1930年那篇評論《戀愛之路》與《赤戀》的論文中，曾說明《赤戀》女主角華茜麗莎「依據著『戀愛只是私事，工作更加重要』的信念，重新走上了新時代建設的過程。」但夏衍並未如秋田雨雀那般凸顯「事業大於戀愛」是柯倫泰的主要論見，此後數年也未見其他論者提及。所以，我認為秋田雨雀在1934年被三位中譯者介紹到中國的這篇文章，對宣揚柯倫泰「事業大於戀愛」的論點，較具代表性。這三個中譯本，為秋田雨雀著，青玉譯，〈女權論者柯倫泰女士述評〉，《每周評論》，第45-46期(上海，1934.02)，頁33-37；秋田雨雀著，梅格譯，〈柯倫泰女士〉，《東方雜誌》，第31卷第5期(上海，1934.03)，頁4-10；秋田雨雀著，沈茲九譯，〈女權論者柯倫泰〉，《時事編類》，第2卷第22期(上海，1934.09)，頁101-107。

秋田兩雀標舉出柯倫泰「事業大於戀愛」的見解，在中國知識群中迅速發酵。某些女作者尤表認同，並開始援此論調重新定位柯倫泰的戀愛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知識女性並未追隨秋田兩雀批評柯倫泰的「同志愛」，而只聚焦她「事業大於戀愛」的理念。⁹⁷此後到抗戰期間，也有數篇文章凸顯柯倫泰「事業應大於戀愛」的見地；這多少反映她的新女性論得以突破蓋尼亞的形象，而啟發某些中國女性。⁹⁸發揚「事業大於戀愛」的論者，強調重新配置個人公私生活的比重，不以私害公，但並未棄絕戀愛。相較於蓋尼亞式的無愛性交自由，「事業大於戀愛」的戀愛觀，賦予中國女性更多能動優勢。發揮柯倫泰此一觀念的中國女論者相信，事業比戀愛更允許女性掌握自己的人生。這番看法，既告別 1920 年代早期盛行的戀愛自由論，也揚棄該年代末左翼知青舉柯倫泰而發的性慾自由觀。

除了「事業大於戀愛」的新女性形象之外，在這波柯倫泰作品譯介潮較重要的代表作，為初版於 1937 年的柯倫泰《新婦女論》。柯倫泰作品第一波譯介高潮，代表作為〈三代的戀愛〉及之後的《赤戀》等小說集。那時的討論重點是戀愛，性與愛的分合及對「戀愛是私事」的回應。1930 年代中後期的第二波譯介高潮，明顯轉向為著重婦女問題及解放。《新婦女論》可謂此階段翻譯柯倫泰作品最具分量者。譯者沈茲(1898-1989)與羅瓊(1911-2006)皆屬左派婦運健將；兩人都在抗戰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新婦女論》乃沈、羅兩人根據大竹博吉的日文版本而譯。⁹⁹該書原名《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эволюции хозяйства*)，出版於 1922 年，是柯倫泰在莫斯科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Я. М.

⁹⁷ 編者，〈讀書問答：『小小十年』中所表現的婚姻問題〉，《申報》(上海)，1934 年 4 月 9 日，第 3 張 12 版；婦女周刊，〈編後〉，《南寧民國日報·婦女周刊》(南寧)，1936 年 4 月 9 日，第 4 張 11 版；茲九，〈劉景桂情殺案判決感言〉，《申報》(上海)，1935 年 5 月 5 日，第 5 張 18 版；〈柯崙泰〉，《福建婦女》，第 1 卷第 6 期(永安，1943.04)，頁 38。

⁹⁸ 〈柯崙泰〉，頁 38。

⁹⁹ 羅瓊，〈中譯本再版序言〉，收入柯崙泰著，沈茲九、羅瓊譯，《新婦女論》(上海：三聯書店，1951)，頁 1。

Свердлова)教授婦女問題時的講義。¹⁰⁰沈茲九將柯倫泰提升到倍倍爾後繼者的地位，形容《新婦女論》為「說明婦女解放路徑的論著」。¹⁰¹沈茲九在日本勢力步步進逼中國之際，希望透過介紹柯倫泰在該書描述的蘇聯婦女革命鬥爭，期許中國女讀者有為者亦若是。《新婦女論》出版後，確實被某些論者評為「現代男女必讀的好書」。¹⁰²

《新婦女論》既顯示兩位女譯者跨語際互文對話且不盲從外文原著的獨立思考力，也反映她們無法完全擺脫共產主義大敘事的影響。沈茲九與羅瓊主要透過各自的譯序，來展現這些能力及所受的意識形態影響。沈茲九寫於1937年版的譯序切合中共的思維模式，高度推崇蘇聯已臻「真正男女平等」之境。她如喊口號一般：「在現階段上，中國婦女運動的唯一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¹⁰³該書於1951年出校訂版時，羅瓊的譯序則與柯倫泰進行互文思想交流，並反駁後者論見。羅序說明此書乃依據大竹博吉的日文版所轉譯，但初版後逐漸發現原著某些觀點與她們的譯文「都有重要的缺點和錯誤」。¹⁰⁴羅瓊接著指出柯倫泰書中主要的「不正確觀點」，一是主張婦女受壓迫的歷史關鍵是性別的勞動分工、而非私有財產制，二是認定家庭將在社會主義社會瓦解，由國家社會各種集體組織取代。

此處重點並非評判兩人見解孰是孰非，而在凸顯羅瓊如何引經據典指正她所謂柯倫泰謬誤之處。羅瓊援用恩格斯及倍倍爾等共產主義經典的中文譯著(譯者皆為男性)，建立起「歷史唯物論」立場，並據此駁斥柯倫泰。寫於中共建國初期的羅序，充滿著藉中外男知識人建構的正統馬克思共產主義權威，追求意識形態正確的意味。羅瓊批駁柯倫泰所展現的自信(「柯倫泰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不對」)，源於她認同的男性本位大敘事所賦予的知識權力。至於

¹⁰⁰ А. Коллонтай,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эволюции хозяйства*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мени Я. М. Свердлова, 1922), <http://books.e-heritage.ru/book/10077007>, 擷取日期：2024年9月19日。筆者感謝好友陳仁姮教授協助找到這本柯倫泰的原著資料。

¹⁰¹ 沈茲九，〈譯者序〉，收入柯倫泰著，沈茲九、羅瓊譯，《新婦女論》，頁1-3。

¹⁰² 素斐，〈讀新婦女論〉，《婦女生活》，第4卷第4期(上海，1937.03)，頁38-39。另見白葦，〈『新婦女論』〉，《讀書》，第1卷第1期(上海，1937.05)，頁51-52。

¹⁰³ 沈茲九，〈譯者序〉，頁1-3。

¹⁰⁴ 羅瓊，〈中譯本再版序言〉，頁1-16。

她與沈茲九如何看待柯倫泰書中保障墮胎及非婚生子女權益的主張，則因兩人未提及而無從得知。但《新婦女論》已多少允許我們窺知柯倫泰的第一線中文譯述行列裡，較罕見的中國女性言論表現。

由本節可知柯倫泰的情慾及女性作品，自 1930 年代後被某些中國左翼女論者在跨國多語際的脈絡下，賦予了突破戀愛、解放女性的新思想動能。她們沒有先前男文青從性慾解放視角詮釋柯倫泰的執著，因此避免因在戀愛是私事與否的漩渦中打轉。這些學有專長的女知識人希望擺脫情慾帶給女子的束縛，卻不認同蓋尼亞而多青睞華茜麗莎。她們著重發揮的華茜麗莎特質，是女性經濟自主且能貢獻社會的能力。此番言論，實符合男性本位女權論鼓吹女性在公領域的發展與權益之見，而尚未觸及婚戀家庭對女性不利之處。

七、結論

柯倫泰反傳統情慾思想的獨特本質，在她從建立集體新道德的層次，重新定位個人性愛表現。正是此一無產階級新親密關係的論述，最能展現柯倫泰女性本位的特色，也最不為列寧等男性本位思想者苟同。對列寧與史達林等俄共領袖而言，十月革命帶來的政治與社經變革才是要緊事。革命後通過的婚姻、家庭及生育法律，已被布爾什維克政權視為解放婦女與男女平等的終極表現。柯倫泰及某些女同志，則充分了解當時蘇俄社會法律先行、觀念落後的巨大挑戰。當其他女同志專注於協助工農婦女克服生活、生育與工作困境時，柯倫泰除此外還有更大的企圖心。她想要根本改變作為資本主義道德根基的性別秩序，以真正鞏固新興的無產階級體制與倫理。她的情慾理念與新女性見解，都是出於這番企圖而發。柯倫泰希望藉群體互助互愛與各種集體設施提供的資源，讓女性確實擺脫家務勞動、生育壓力與經濟弱勢等多重劣勢。她出於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所詮釋的戀愛觀，不只顛覆資本主義戀愛道德，也挑戰資本主義男女結合的一夫一妻體制。誠然，柯倫泰曾在〈戀愛與新道德〉聲明「基於『大愛』的一夫一妻制結合仍然是理想的。不過，此聲明有著清楚的但書，即這種結合既非永久也無須固定，且同時允許本於和

諧的「同志愛」紐帶所發展的「情慾友誼」(эротической дружбы)。¹⁰⁵要言之，柯倫泰凸顯無產階級「一切為群體」，以揚棄資產階級「一切為個人」的新戀愛意識。放眼當時歐美女共產主義領袖，柯倫泰的情慾觀可謂獨領風騷，卻也因此成為眾矢之的。

柯倫泰此番革命性論述，觸動了男性本位權勢者無心真正挑戰性別秩序的敏感神經，導致她的情慾觀備受當時及後世的俄國主流社會抨擊醜化。以列寧為首的俄共領袖，強調蘇俄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下，將發展出健全(而非資產階級腐敗)的一夫一妻制。但究其實，無產階級的婚姻家庭生活多延續資產階級妻子負責家務撫育的形態，人妻承擔的公私雙重負擔並未消失。這樣的蘇俄新社會一夫一妻制，仍是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可想而知，這些無意改變兩性結合形式的男性本位者(男女皆有)，頗反感於柯倫泰無端吹皺一池春水。她所主張情慾結合的自發與多樣性，尤其惹怒列寧等當權者。列寧曾藐視柯倫泰的觀點「幼稚膚淺」(half-baked)。¹⁰⁶自柯倫泰失勢後，追求政治正確或忌妒她的同志，更無所顧忌於對她的攻訐。柯倫泰以小說(特別《三代的戀愛》之開放性結局)表達對革命後俄國性問題的思考，更予讀者自由詮釋的空間。政治力的干擾操作、小說的多義複音以及論者的自行，交織出柯倫泰被敗壞的名聲。她被冠上一杯水主義宗師、腐化青年道德的虛假馬克思主義者等污名，以及導致俄國青年性淫亂失序的罪魁禍首。¹⁰⁷

尤有甚者，柯倫泰的情慾思想傳播到國外之際，仍持續受到各國男性本位共產主義者的打壓。本文後半段已清楚呈現批判柯倫泰(主義)的日本或中國左翼知青，都高懸列寧或史達林掌控的蘇聯政策為圭臬，來指責她偏離共產主義正宗的情慾理念。這種「政治正確」的心態，驅使許多日、中男女論者追隨蘇聯統治者，繼續將柯倫泰視為政治異類。她的情慾思想，連帶也被貼上可能危及普羅塔列亞純正婚姻生活的標籤。不論看似開明的列寧或保守立場鮮明的史達林，都不樂見柯倫泰意圖真正解放女性的無產階級性道德。

¹⁰⁵ Alexandra Kollontai,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25.

¹⁰⁶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860.

¹⁰⁷ Gregory Carleton, *Sexual Revolution in Bolshevik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47.

主流共產主義的男性本位思維，從未如何倫泰那般願給女性選擇獨身或結婚的完全自由。

以上因素，使柯倫泰的思想容貌，在跨國流轉的旅程中被披上多層面紗，需努力逐一揭開才得窺其廬山真面目。陳相因專注於從一杯水主義的視角出發，所以認定在民國譯介柯倫泰思想的過程中「愛情被消失」。¹⁰⁸然依本文的綜合考察，譯介柯倫泰的民國論述並未讓她論愛的那部分完全消失，當時對一杯水主義的批判也並未都歸責於柯倫泰。此外，近代中國對柯倫泰戀愛觀的理解，有不同階段的重心轉移。林房雄歸納的「戀愛是私事」，主導了1920年代末論述柯倫泰戀愛觀的方向。秋田兩雀推崇柯倫泰「事業大於戀愛」的發現，則成為1930年代中國作者評述柯倫泰女性論的基調。柯倫泰婚戀觀在中國的譯介，反映論者受自身政治意識形態左右而對其作品片面理解、乃至以訛傳訛的特色。在共產主義解放大敘事的跨國多重脈絡主導下，民國論者都意在發揚階級革命精神及與之呼應的(女)性解放。但柯倫泰作品中展現的女性本位意識，不論對家庭瓦解的期許或主張打破男女性別分工的權力階序，都被層層具有男性本位意識的譯介思維逐一濾除。

¹⁰⁸ 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頁19。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報刊雜誌

〈三種戀愛觀〉，《民國日報贛南版》(贛縣)，1943年11月2日，1版。

弋靈，〈十三：新戀愛問題關於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414-1419。

白葦，〈『新婦女論』〉，《讀書》，第1卷第1期(上海，1937.05)，頁51-52。

伏園，〈九：我們將有自己的三代的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99-1400。

安之，〈八：用相對性原理來應「新女性」九月號裏所徵求的關於新戀愛問題的解答〉，《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90-1399。

朱梅，〈四：戀愛的現在與將來〉，《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73-1376。

李君毅，〈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婦女雜誌》，第17卷第7期(上海，1931.07)，頁135。

李鐵民，〈蘇聯青年男女的性道德標準〉，《真理與自由》，第3期(上海，1946.01)，頁19-21。

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的性文學」問題〉，《文藝講座》，第1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頁289-296。

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33-1051。

波弟，〈十四：讀三代的戀愛後〉，《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419-1422。

- 姚方仁，〈二：關於『三代戀愛』的分析觀察〉，《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63-1370。
- 〈柯崙泰〉，《福建婦女》，第1卷第6期(福建，1943.04)，頁38。
- 柯倫泰著，沈端先譯，〈新婦人〉，《新女性》，第4卷第1期(上海，1929.01)，頁1-51。
- 柯倫泰著，辛如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與婦女勞動〉，《女子月刊》，第4卷第11期(上海，1936.11)，頁22-29。
- 柯倫泰著，芝葳譯，〈三代的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31。
- 柯倫泰著，陶父譯，〈婦女與家庭制度〉，《新女性》，第4卷第8期(上海，1929.08)，頁32-50。
- 洪鈞，〈六：『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79-1383。
- 秋田雨雀著，沈茲九譯，〈女權論者柯崙泰〉，《時事類編》，第2卷第22期(上海，1934.09)，頁101-107。
- 秋田雨雀著，青玉譯，〈女權論者柯倫泰女士述評〉，《每周評論》，第45-46期(北京，1934.02)，頁33-37。
- 秋田雨雀著，梅格譯，〈柯倫泰女士〉，《東方雜誌》，第31卷第5期(上海，1934.03)，頁4-10。
- 〈排完以後〉，《新女性》，第3卷第3號(上海，1928.03)，出版頁。
- 〈所謂柯倫泰主義的戀愛觀及其批評〉，《玲瓏》，第5卷第36期(上海，1935.09)，頁2377-2378。
- 孫福熙，〈十：三代的戀愛的二人的談話〉，《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401-1406。
- 素斐，〈讀新婦女論〉，《婦女生活》，第4卷第4期(上海，1937.03)，頁38-39。

- 茲九，〈劉景桂情殺案判決感言〉，《申報》(上海)，1935年5月5日，第5張18版。
- 酒泉，〈「公妻」的謠言與列寧的戀愛觀〉，《大公報香港版》(香港)，1949年5月24日，第2張8版。
- 高群逸枝著，芳子譯，〈排官僚的戀愛論——關於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1052-1058。
- 婦女周刊，〈編後〉，《南寧民國日報·婦女周刊》(南寧)，1936年4月9日，第4張11版。
- 章錫琛，〈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婦女雜誌》，第16卷第7號(上海，1930.07)，頁63-66。
- 陶景元，〈蘇聯的風景線〉，《民國日報江西版》(江西)，1942年3月1日，4版。
- 馮雪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上海，1931.11)，頁2-7。
- 樂天，〈名詞淺釋：柯倫泰主義〉，《自修》，第188期(上海，1941.10)，頁8。
- 潘天覺，〈在蘇聯一年(十)〉，《民國日報贛南版》(贛縣)，1942年2月13日，3版。
-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47-1362。
- 編者，〈新戀愛問題——徵求解答——〉，《新女性》，第3卷第9號(上海，1928.09)，頁986。
- 編者，〈讀書問答：『小小十年』中所表現的婚姻問題〉，《申報》(上海)，1934年4月9日，第3張12版。
- 靜遠，〈七：戀愛至上感的抹殺〉，《新女性》，第3卷第12號(上海，1928.12)，頁1383-1390。
- 駱劍冰，〈柯倫泰主義與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生存月刊》，第4卷第4期(上海，1933.08)，頁86-89。

- A. 柯倫泰著，蓓蓓譯，〈蘇維埃婦女是有完全權利的公民〉，《中蘇文化雜誌》，第 18 卷第 3 期(重慶，1947.03)，頁 3-6。

(二)專書

- 丁丁編，《革命文學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30。
- 丁易編，《大眾文藝論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51。
- 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婦女問題十講》，上海：開明書店，1927。
- 牟宗三，《五十自述》，臺北：鵝湖出版，1993。
- 柯倫泰著，李蘭譯，《偉大的戀愛》，上海：現代書局，1930。
- 柯倫泰著，周起應譯，《偉大的戀愛》，上海：水沫書店，1930。
- 柯倫泰著，沈茲九、羅瓊譯，《新婦女論》，上海：三聯書店，1951。
- 柯倫泰著，沈端先譯，《戀愛之路》，上海：作新書社，1928。
- 柯倫泰著，沈端先、汪馥泉譯，《戀愛與新道德》，上海：北新書局，1929。
- 柯倫泰著，溫生民譯，《赤戀》，上海：啟智書局，1929。
- 柯倫泰著，溫生民譯，《戀愛之道》，上海：啟智書局，1929。
- 柯倫泰著，楊騷譯，《赤戀》，上海：北新書局，1929。
- 胡也頻，《到莫斯科去》，上海：光華書局，1930。
- 倍倍爾著，沈端先譯，《婦人與社會》，上海：開明書店，1927。
-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 孫起孟、孫蘊，《戀愛觀與戀愛藝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49。
- 梅子編，《非「革命文學」》，上海：光明書局，1929。
-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
- 許慧琦，《破繭而出：民國女性本位的跨文化現代情慾論述(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即將出版。

-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09。
- 熊權，《革命加戀愛現象與左翼文學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蔡孝乾，《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2002。
- 鄭超麟，《史學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1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 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 V. 斯維得洛夫著，常樂生譯，《新家庭論》，無錫：新華書店，1949。
- Bebel, August. *Women Under Socialism*. Translated by Daniel de Leon (New York: Labor News Company, 1904.
- Bryant, Louise. *Mirrors of Moscow*. New York: Thomas Seltzer, 1923.
- Carleton, Gregory. *Sexual Revolution in Bolshevik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5.
-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 Clements, Barbara Evan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Farnsworth, Beatrice.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Fiqzpatrik, Sheil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Goldman, Emma. *Living My Life*. Vol. 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 Kollontai, Alexandra. *Love of Worker Bees*. Translated by Cathy Porter. London: Virago, 1977.
- Kollontai, Alexandra.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Translated by Alix Holt.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 1977.
- Kollontai, Alexandra. *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 Love and the New Morality*. Translated by Alix Holt. Bristol: Engl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2.

Kollontai, Alexandra.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

Translated by Salvator Attanasio.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Meisel-Hess, Grete. *The Sexual Crisis: A Critique of Our Sex Life*. Translated by Eden and

Cedar Paul. New York: The Critic and Guide Company, 1917.

Naiman, Eric. *Sex in Public: The Incarnation of Early Soviet Id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三)論文

方維保，〈柯倫泰夫人小說的譯介與中國“紅色羅曼蒂克”的創作〉，《南京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5期（南京，2019.09），頁144-152。

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入呂芳上主編，

《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吳佩珍，〈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

收入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臺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20。

林威杰，〈共產黨人的道路抉擇：蔡孝乾的「叛變」與轉變〉，《東吳歷史學報》，

第41期（臺北，2021.12），頁91-139。

- 高俊傑，〈「革命加戀愛」主題下的革命女性：以柯倫泰作為方法的矛盾及蔣光慈小說〉，收入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20。
- 許慧琦，〈愛倫凱在中國：文化轉譯與性別化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7期(臺北，2021.06)，頁1-69。
- 陳相因，〈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50期(臺北，2022.06)，頁1-41。
- 陳相因，〈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9期(臺北，2011.12)，頁1-31。
- 陳相因，〈嫵嫩、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與文學實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4期(臺北，2019.03)，頁78。
- 熊權，〈論時代思潮中的“戀愛與革命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北京，2015)，頁95-105。
- Martin, John Levi. "Structuring the Sexu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5, no.1 (1996): 105-151.

(四)網路資料

- Kollontai, Alexandra.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Alexandra Kollontai. *Red Love*. New York: Seven Arts Publishing Co., 1927. Online version from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red-love/ch00.htm>. 擷取日期：2024年4月14日。

Коллонтай, А.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эволюции хозяйства.”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мени Я. М. Свердлова, 1922. <http://books.e-heritage.ru/book/10077007>. 擷取日期：2024 年 9 月 19 日。

Kollontai in China: Male-Centered Presumptuous Translation of Eros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Hsu, Hui-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ideological journey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Alexander Kollontai's ideas on sexuality and feminism to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ighlighting how her controversial views on love and sexual liberation were transformed by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intellectuals. Focusing on th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her thought,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her works underwent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and gendered reinterpretations in the male-dominated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Republican China. Through this lens, it demonstrates how Kollontai's original feminist messages were manipulated to align with local gender norms, obscuring her true intentions.

Building on Shih T'an's concept of "double contextualization,"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idea of "triple contextual gendering," revealing how Kollontai's writings wer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intersecting lenses of Soviet Russia, Japanese commentators,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These male translators often misread her critique of bourgeois marriage, portraying her advocacy for sexual liberation in distorted ways. The article also contends that the prioritization of Japanese leftist critiques and local biases over a faithful understanding of Kollontai's ideas led to further misinterpretations of her views on sexuality.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argues that Kollontai's critique of bourgeois sexual morality was aimed at constructing a new proletarian sexual ethic and not the "Glass-of-water" sexual philosophy often ascribed to her. Republican-era Chinese translators, however, often misrepresented her stance, influenced by Japanese left-wing writings, thus contributing to a skewed interpretation of her work. By examining these misreadings and tracking the evolution of critical works on Kollontai in 1930s and 1940s China, th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her ideological footprint in shaping Chinese discussions on love and sexuality.

This study ultimately provides a clearer picture of how Kollontai's discourse on love and sexuality influenced Republican China while being reshaped and re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and gendered contexts. The aim is to reveal how her revolutionary feminist ideas were co-opted into a narrative that both misrepresented and altered her original goals, reflecting the broader challenges faced by feminist thought in cross-cultural intellectual exchanges.

Keywords: Kollontai, Republican China, discourses on Eros, translation, Glass-of-Water Theory